



高洪太创始于1914年，特色铜锣为世界知名乐团选用，2016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汉口盛锡福创始于1936年，以“头戴盛锡福，脚踩内联升”传誉市场，2016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2年第11期(总第361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严濂

编辑：许濛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高洪太铜锣“一锤定音” / 朱汉桥（口述） 方三勤（整理）
- 8 盛锡福帽子“冠盖华中” / 任炳环

九城同心

- 12 起底江汉石油大会战 / 关贤安

三镇拾遗

- 19 黄鹤楼下收藏“黄鹤楼” / 朱汉昌
- 24 汉口徽商与汉正街新安书院 / 王光

委员天地

- 28 在学中悟，在习中成 / 刘珍秀
- 31 数字传承文明 阅读创造未来 / 陈曲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 35 传承奋斗基因，续写新时代烘焙风云录
/ 陆伟（口述）南方（整理）

人物春秋

- 40 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 曹小麓

都市史话

- 49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上） / 董玉梅

往事漫忆

- 56 科技人文相宜 学术人品俱佳——送别杨叔子校长
/ 吴廷俊

史海钩沉

- 60 “三人照”上的高欣荣与林巧稚 / 姬绍先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价：8 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sl@163.com

高洪太铜锣“一锤定音”

◇ 朱汉桥（口述） 方三勤（整理）

响锣，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历史悠久，相传由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古代官吏出巡“鸣锣开道”以示官威，民间广泛用于戏曲舞台，同时也是西洋交响乐团唯一必备的中国民族乐器。

武汉制锣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年间，当时汉锣、金锣、风锣、苏锣并称全国“四大名锣”。1980年代，如果你去欣赏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会听到武汉“高洪太”铜锣的独有声响。德国柏林交响乐团等著名乐团，演出用的铜锣，也都出自高洪太。

为梅兰芳剧团试制“虎音锣”

高洪太是武汉著名老字号，迄今已有百年铜响器制作历史。创始人高青庵，生

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老家在黄陂高家河。高青庵12岁到汉口舅舅的锣店学艺，后因经营状况不好，舅舅打算卖掉锣店，他就找亲友借了一笔钱，盘下了锣店。

开始，高青庵在长堤街丁家巷口租房经营。1914年，他在长堤街262号正式挂出“高洪太铜响器店”招牌，这个日后传遍世界的老字号由此诞生。

“高洪太”源自高青庵和弟弟高太安的名字。按高家族谱，高青庵原名高章洪，高太安原名高章彩，而“洪”“太”两字较响亮，于是各取一字组合而成。起初兄弟俩一起经营，后因黄陂老家有事，高太安回去料理，担子落到高青庵一人肩上。

高洪太同许多老字号一样，采用前店后厂的格局。经过20多年苦心经营，高青庵的财力有很大增长，1936年前后在长堤



高洪太生产车间一角

街买了一幢大房子，扩大生产规模，能生产手锣、双光钹等铜响器 30 余种。那时没有机械全凭手工，生产工具主要是锤子和炉子。

1938 年武汉沦陷，高洪太几乎陷入停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逐渐恢复。同时期，武汉制作铜响器的还有“德昌生”“周洪大”“熊顺泰”等，竞争非常激烈。高洪太在竞争中发展壮大，靠的是高质量和高信誉。高青庵对原料铜、锡的要求极严，决不掺假。宁可产量低，也要精心制作，绝不因赶工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定好的价格，交货时一定按约交易。

高洪太不断试制新产品，创制“虎音锣”尤为人们津津乐道。1946 年，高青庵接到上海分销店“老德泰”的老板居德隆来信，梅兰芳剧团的乐师希望能买到一种模拟虎啸声的锣，用以演出中呼应“老爷升堂”时衙役的呐喊，以增强演出效果。

高青庵令高徒高永运用大古锣加工改制。经高永运反复琢磨试制，终于改制成一种音质纯而“虎味”浓的新锣，适合京剧花脸行当的要求，梅兰芳剧团试

用后深为满意。因此，“老德泰”将这种锣命名为“虎音锣”，高洪太名扬全国，在业界声望大增。

赠送波士顿交响乐团大抄锣

30 多年来，高永运带领艺徒高永铨等人，特制和改制的各种铜响器达 18 种之多。他灵活运用“正锤、反锤，轻锤、重锤，虚锤、实锤”的独特技巧，因锣施锤，锤锤有章法，锤锤有变化，能准确定出各种不同的音响效果，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被剧团尊为“一锤定音”的制锣王。

1965 年，全国第三次铜锣评比，高洪太手锣得了特等奖，虎音锣获一等奖。这样的评比后来举行多次，高洪太的成绩都位居前列。

1967 年，高青庵中风于次年去世。高青庵的晚辈中，仍在高洪太的只唯有高永铨，因此成为第二代传人，主要负责定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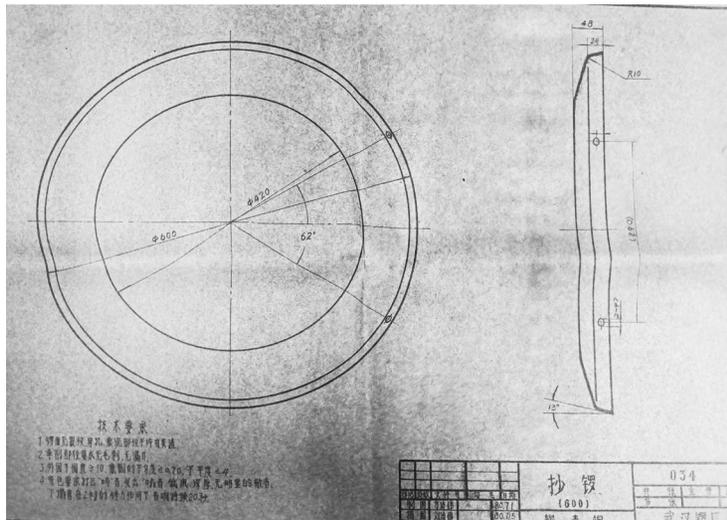
1979 年，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中央乐团决定赠送一面锣作为礼物。为此，高洪太制作出



1963 年高洪太第二代传人高永铨全家福

了一面直径一米的大抄锣。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都体育馆首演前，敲响了这面大抄锣，乍地一锤，顿时如猛虎下山大吼，随之啸音长鸣轰动全场。

从此，高洪太铜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一流锣厂。1985年，日本名古屋市长写信给武汉市市长，希望高洪太做一面世界最大的锣。15位师傅历时近10天，制成两面锣。1986年4月17日，一面直径142厘米、重100多公斤的大抄锣，从武汉港发往名古屋，被名古屋市长取名“武汉”。另一面锣，一直陈列在高洪太。



1980年代抄锣设计图纸

1980年代初，高永铨开始担任全国铜响器质量评比会总工艺质量检测组组长，由他起草制定了评比标准。去年，帮助我整理文稿的摄影师方三勤，在东西湖常青花园找到高永铨的儿子高建华。高建华收藏有父亲高永铨生前写的《锣响乐器生产工艺流程》《铜响乐器产品目录》《浅谈制锣》等手稿，还有2008年湖北省文化厅《命名高永铨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洪太铜锣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证书。

比利时举办《武汉十二锣》云首演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高洪太由于坚持手工制作，保质而量少；加之经营不善，慢慢走向下坡路。

2000年高洪太改制，由一家房地产商收购，更名为“武汉洪发高洪太铜响乐器有限公司”，厂址迁至江夏区郑店街。

改制前我任副厂长，改制后任经理至今。公司目前有10多名师傅，平均年龄过了半百。其中两人为省、市级铜锣制作技艺传承人，尤其是陆国年成为高洪太第三代定

《全国响铜乐器行业志》汇编工作会议

要 要

根据一九八六年十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响铜乐器行业会议精神，《全国响铜乐器行业志》（以下简称《行业志》）汇编工作会议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在江苏苏州举行。会期十五天。

参加《行业志》编志组的厂有武汉锣厂、天津市锣厂、周村鲁东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三厂、山西长子铜乐器厂。除山西长子铜乐器厂的编志成员因故未到外，其余厂的五名编志成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全国响铜乐器行业技术协作组常务小组组长厂代拟，武汉锣厂副厂长高永铨主持。会议期间，苏州民族乐器三厂的党政领导到宿地看望编志组成员。

会议认真讨论了《行业志》汇编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响铜乐器是我们中华民族乐器独有的工艺品，是传统戏剧民间娱乐的打击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尚未有一部比较完整记录响铜乐器行业的史册。《行业志》的汇编是十分必要的，使我们更进一步介绍了响铜乐器行业的发展史，为响铜乐器探索改革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我们后代保存了可供借鉴的史料。《行业志》是纪实性的历史文献，因此汇编工作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记述真实有案可稽。

会议酝酿起草了《行业志》的纲目，《行业志》纲目分四编若干章节。第一编历史沿革部份，记录了响铜乐器行业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二编各厂简介部份，记述了响铜乐器生产单位

~1~

1980年代全国响铜乐器行业志会议纪要，现收藏于高永铨儿子家中

音师，并在2014年评为湖北省“百名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师”。但公司总体上后继乏人，我们不能争老大了。

好在武汉“海平乐器”传承汉锣工艺，它的前身是黄陂高家河锣厂。早在1984年，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海，看到许多从高洪太退休的老师傅回乡，决定办一家锣厂，起初只能帮国营锣厂加工。但王长海懂经营、善言辞、肯吃苦，为了争取产品出口，他能在外贸公司门外等候一个多星期。他更能背着100多斤铜锣上火车，买不到坐票就站在角落，从东北到岭南，走遍大半个中国，终于打开了市场。

1987年，海平乐器迁址至黄陂甘棠镇，建立现代化工厂，并吸收更多世家锣匠加入。1992年创立“芳欧”商标，1998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全面拓展国际业务，2003年在十几个国家注册“东声”商标，2013年汉锣制作技艺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芳欧”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有业内人士质疑，都是铜锣技艺，何以能两次入选非遗？况且非遗传承讲究“血脉渊源”，只有高洪太才是正统。非遗评选负责人王建军解释说：对于非遗而言，重要的是传下去，而非传给谁。“我们提倡社会传承，即同一个非遗项目可以有多个保护单位。”既不能否定高洪太铜锣的贡献，也要记录武汉铜锣的历史流变。“从目前来看，称作‘汉锣技艺’更为准确合适。”

海平乐器生产风锣、抄锣、包锣、云锣、奉锣、月光锣等品种，直径从10厘米至186厘米不等，拥有十几项专利，年产量



高洪太参加北京国际乐器展

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产品60%销往海外，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著名音乐家谭盾说：“我合作过的全球各大乐团，无一例外都在使用武汉大锣。”

2020年2月15日晚，在一个全球抗疫的特殊时刻，谭盾在比利时伊丽莎白音乐厅举办《武汉十二锣》云首演，运用“5G科技与灵魂拥抱”的思路，与世界各国音乐家齐奏中国锣。锣声蕴含对人类生命的赞美，寄托对武汉人民的祝福，表达对全国乃至世界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的崇高敬意。

我和海平乐器的现掌门人王志平，虽然担心两家的锣匠年龄偏大，但相信未来，也努力传承，不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荣誉，让武汉铜锣发出的锣声更为响亮。

朱汉桥，武汉高洪太铜响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三勤，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二级调研员

盛锡福帽子“冠盖华中”

◇ 任炳环

武汉盛锡福地处天下闻名的汉正街，是全国盛锡福行业协会的八个理事单位之一，成功举办了五届全国帽业联合会议，2016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创业：四十箱草辫来汉开分号

说起盛锡福，大家很容易想起那句“头戴盛锡福，脚踩内联升”。自创立以来，盛锡福历经风雨，用品质和信誉传承老字号招牌，成为有口皆碑的制帽专家。

盛锡福起源于天津。早在1911年，山东掖县人刘锡三与人合伙在天津估衣街租了一间门面，开设了一家“盛聚福”帽庄，制作销售草帽。合伙人故世后，刘锡三独资经营并扩大规模，将店名改为“盛锡福”。

刘锡三两次花巨资购进外国先进设备，

重金聘请技师，从同业中挖取技术骨干，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吸纳国内制帽工艺的绝招，借鉴国外制帽的先进技术。很快，盛锡福的帽子因做工精良、样式新颖、定价低廉成为畅销货，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南洋，在制帽业脱颖而出。

难能可贵的是，刘锡三没有把盈利用于买房置地，而是不断投入扩大再生产，壮大自身产业、扩大帽子销路，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济南、青岛、徐州等地设立分号，所在处全是繁华闹市。各地分号除经销总号生产的帽子之外，还在当地组织作坊生产，以弥补总号产力的不足；同时搜集各地市场信息和技术情报，使盛锡福改进老产品、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同行。

汉口盛锡福就是在这一时期设立的。1936年，刘锡三委派代理人刘志斋在汉口



天津盛锡福创始人刘锡三

（现中山大道764号）开办了“天津盛锡福汉口发行所”，专营天津盛锡福的礼帽，也经营一些上海的帽子，附设洗帽和整烫帽子的业务。

1938年，日本人占领武汉，抢占了汉口发行所的店铺办洋行。盛锡福的员工只得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周宇帮带领到后方开办重庆发行所，一部分绕道香港回天津总号。

1939年，刘锡三想恢复汉口发行所，问天津盛锡福的店员谁愿去，彭锡良毛遂自荐，便拨了他四十箱草辫（制帽衬料）做本钱。彭锡良来到汉口，将四十箱草辫卖掉，在汉正街（当时属难民区）石码头买了品芳照相馆的一块空地，盖起了两层楼房，专门经营帽子。1945年日本投降后，盛锡福收回了中山大道店铺，1946年开业维持经营。

新生：一天有一万多人买帽子

1949年武汉解放，盛锡福成立民主管理小组，组长彭锡良，副组长赵元凯，员工只有20人，没有生产车间。1951年，因礼

帽生意不好做，才正式设立车间，生产工人帽和便帽。车间设在中山大道店铺的四楼，总共只有6台缝纫机。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57年又实行大合营，盛锡福与上海帽店、良友帽厂、欲兴帽厂、东升昌帽厂、益昌祥帽厂、小苏州帽子坊、自成帽子坊等9家合并，定名为“武汉盛锡福制帽厂”，全厂员工达122人。中山大道764号为门市部，人和街93号为车间，行政办公室设在车间楼上。

1958年门市部主要销售自产品，同时给武汉市百货批发公司加工各种单、夹、棉毛和童帽，帽子的式样由百货提供；夏天给土产公司生产草帽。只设一个业务员，负责购回计划供应的原料。

1966年横扫“四旧”开始，盛锡福受到冲击，拆毁了老式牌楼，改名为“人民制帽厂”，但从未停止生产。后期实行行业归口，划归市纺织品公司管理，员工人数发展到167人。生产基本以自产自销为主，门市生意很好，经常挤破柜台。1974年在公司的支持下，将人和街93号的一座四面透风的平房进行了改建，紧接着又将纱坊巷的压帽车间改建成三层楼房。1978年新厂房建成（即现在的厂房），占地面积为818平方米；加上中山大道门市部、民族门市部，总面积为2282平方米。

1979年喜迎改革开放春风，盛锡福恢复老招牌，老书法家王遐举为之题写“名驰津汉三千里，冠盖华中第一家”。

1980年市场竞争初见端倪，为了增加花色品种，适应市场需求，组建了技术设计室，专门负责设计新产品、制作新样板，组长由原天津总号的老店员赵元凯担任。同时，管理层实行年轻化，经群众推荐和差额投票，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



1970年代武汉盛锡福成立挂牌

这一时期，生产经营较稳定，冬天生意好时，门市部一天有一万多人来买帽子，销售额最高达两万多元。一款工作帽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青睐，李先念、韩先楚等老领导委托订制。1986年，“冠福牌”便帽又以设计美观、用料考究、制作精良，评为湖北省优质产品。

到1992年，在市场的挤压下，盛锡福出现下滑之势，上级将之划归中百集团管理。经审计，已欠外债106万元、不当银行贷款79万元、欠税27万元、挂账损失14.6万元，资不抵债跌到破产的边缘。

1993年3月，中百集团任命新的主要负责人，开办第三产业，成立招待所，增加整烫服务，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还清外债，人平增加工资29%，盛锡福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振兴：“盛锡福现象”频现媒体

为了重振雄风，盛锡福适应市场变化，完善企业机制，加强技术中坚力量，努力从亏损的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

厂里聘请了四位老一辈艺人传经，让新一代技术人员掌握传统制帽的工艺诀窍，

结合时代特征和消费需求，大力开发新产品。经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定样修改，设计生产出的工艺帽和棒球帽深受欢迎，仅此两个品种就创利13万元。此外，外贸“西部牛仔帽”2万余顶远销日本，工人帽荣获“省优质产品奖”。一时，“今日盛锡福”“盛锡福现象”“盛锡福启示录”“盛锡福重现生机”等报道和文章，频频出现于各类媒体。

盛锡福从小作坊起步，添置更新机器设备至关重要，新进的高速平缝机、带刀平缝机、双针机、大头机等，大大节约了工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盛锡福改变“以老字号自居”的观念，着眼于打开市场，网点布局市内10个、省外8个，销售7万余顶各类帽子，销售额达187万元。发扬前辈优质服务的作风，设立了定制服务业务，为特大、特小、因伤而残等特殊头型“定制”帽子，获得较好的信誉。同时，利用盛锡福地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地理优势，开发了第三产业，盛锡福招待所一家年创利10万元。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规范管理不断加强、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上，将盛锡福品牌放到中国名牌的地位上，谋求不断巩固和拓展，并列入了省、市发展民族工业的规划版图中。

2000年江汉路改造提升，江汉路盛锡福帽店不得不拆除，由于它承担近三分之二的销售任务，导致帽子生产元气大伤。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中百集团的领导和决策下，盛锡福下决心、花力气进行企业改制，2003年取得成功。

改制后，盛锡福帽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37万元，占地面积1630平米，员工40人，主要从事专业制帽、帽业定制



武汉盛锡福招待所

及批零销售，同时承接制作工作服等业务。对原有员工进行考核，优胜劣汰，与聘用者签订新的用工合同，克服了原有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

新的机制，新的业态，盛锡福一切从“新”开始。

从选料设计到加工制作，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就连帽子里看不见的辅料也从不凑合，要求之严格，较盛锡福旧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员工要求精通一道工序、熟悉并掌握二至三道工序，为下道工序打下基础。如此层层把关，不让不合格的原料进厂，也绝不允许不合格的产品出厂。

为了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增长点，盛锡福不局限于帽子的生产销售，而是把眼光放在系列缝纫制作上。为中百仓储制作的食物帽、白大褂、马甲、围裙、袖套等均得到肯定，订单一单接一单。

然而，盛锡福也遇到遏制发展的“瓶颈”问题。

老厂房地处老城居民区，结构老化破旧，空间狭小昏暗，既没有条件布置一间像样的样品间展示亮点，更无法添置急需的帽子定型机、打扣机等设备，一直眼睁睁看着好市场却无力参与竞争。

此外，尽管在各大商场设有“盛锡福专柜”，但由于不注重营销策划，造成老顾客到处寻找盛锡福，而年轻人又不知盛锡福，乃至人们误以为盛锡福不复存在，宝贵的品牌无形资产白白浪费。加上现有员工大部分又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年龄也越来越老化，急需引进人才，为传承老字号品牌增添活力。

总之，面对新的竞争环境，面对大众需求的新变化，盛锡福面临严峻的考验。老字号不能“倚老卖老”，而要迎合现代审美观，适应现代消费心理和消费偏好，管理也要跟上国际化竞争的趋势。

盛锡福拥有悠久的历史，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武汉盛锡福既生产又经营，在业内有着良好的口碑。目前，全国盛锡福“抱团取暖”，以各自的特色品牌，在兄弟单位间互通有无、连锁经营。北京以皮帽著称，天津以礼帽走红，青岛以童帽享誉，武汉以“冠福”工人帽居首，大家默契合作携手共进，正是盛锡福进一步传承发展的关键。

武汉盛锡福志存高远，将用不断的创新进取，努力实现百年辉煌，并开创下一个百年新纪元。

任炳环，武汉盛锡福帽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从祖父开始三代供职于武汉盛锡福

起底江汉石油大会战

◇ 关贤安

江汉油田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1957年，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乘飞机视察潜江以西的江汉盆地，揭开了在江汉平原进行石油勘探的序幕。此后石油部和地质部的勘探工作者通过区域综合勘探和小型勘探会战，取得了丰富的地质资料。到1965年7月打出第一口油井，历时8年时间。1969年到1972年，江汉平原迎来超过12万人参与的石油大会战，经过近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江汉地区的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星小油井到遍地开花，一座石油之城拔地而起，江汉油田自此诞生。

江汉盆地的第一口油井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作为动力资源，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我国近

代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一直到1949年，年产天然石油不到7万吨。与石油相关的工业品几乎全部被外国列强垄断，中国是外国油品的倾销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石油工业的发展。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的油气资源专门听取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意见。他对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一五计划期间，国内石油工业队伍的主要精力投放在西部甘肃玉门和新疆准噶尔地区，但是没有多大进展。

1954年，李四光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是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地区。1957年，李四光乘飞机视察了潜江以西的江汉盆地，此时国家

石油勘探部署开始东移，年底石油部四川石油勘探局成立两湖（湖北、湖南）勘探大队，于1958年初进入江汉盆地作路线地质测量，开启了对江汉平原的地质勘探。

江汉盆地位于江汉平原中部偏西地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约占江汉平原总面积的74%。在这么大的范围钻井找石油，无异于大海捞针，加上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梅雨季节极易发生洪涝灾害，更是让钻探工作步履维艰，难乎其难。广大勘探工作者在装备落后、物质匮乏的年代，靠着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夙兴夜寐，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付出了艰辛努力。

1958年，地质部湖北石油地质队和中原石油物探大队、石油工业部四川两湖勘探大队101地质队、华北石油勘探处106地质队等单位先后在江汉盆地进行石油勘探。1961年7月，湖北石油地质队在潜江王场钻探了湖北境内的第一口中深探井——王1井，发现4层共6.95米厚的含油砂岩，为湖北省石油地质勘探史上的重要发现。由于湖北省石油地质队缺乏装备、技术，王1井没有进行试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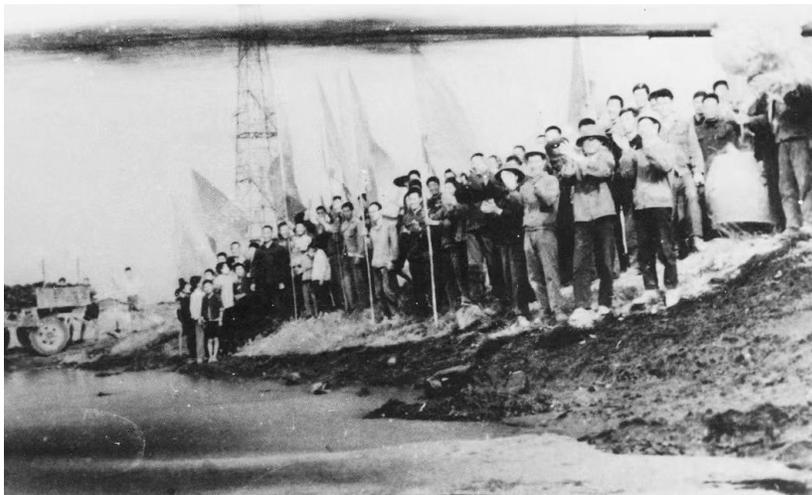
为了尽快在中南地区找到油气资源，改善我国石油工业布局，1961年11月28日，江汉石油勘探处正式成立，下设地震队、钻井队、地质队等12个直属单位，职工564人。石油部陆续从四川石油管理局、贵州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处、海南石油勘探大队抽调人员、设备，加强对潜江凹陷的勘探力量。在1962年初石油部召开的厂矿长会议上，确定江汉的勘探方针是：“重点解剖周矶构造（即王场构造），在有利深凹陷内钻参数井，争取早日突破。”确定潜江凹陷北部是有利的勘探地区，下第三系的“红层”

是有利的勘探目的层系。地质部将原湖北石油地质队和中原石油物探大队分别组建为第五普查勘探大队和第四普查勘探大队，共有职工近千人，充实了技术力量并配备了深钻机。1962年8月到1964年底，勘探队重点在沙市、广华寺地区进行详查，在高场、松滋等地作路线普查，在潜江凹陷开展地面地质详查和钻探工作，先后钻井17口，除在个别地区见到油气显示外，没有取得更大进展。

1964年11月，中共元老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带队到江汉检查石油勘探工作。他鼓励勘探工作者要坚定信心，力争尽早获得勘探上的大突破，他风趣地说：“江汉打不出油，我只好去跳长江。”部领导同志的决心，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响，他们说：“我们要争口气，决不能让何老去跳长江。”

1965年2月，江汉石油勘探处决定将勘探主力集中在潜江凹陷北部地区，重点勘探钟市构造。5月，第五普查勘探大队在王2井发现9层共8.3米厚的油层。7月，第五普查勘探大队在王场钻的王2井，获得了工业油流，成为江汉盆地第一口出油井，这是在湖北，也是在我国的中南地区首次获得的工业油流。不久在王3井获得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王场油田。同年9月，江汉石油勘探处3204钻井队在钟11井发现15层共11.8米厚的油层，完钻测试获得日产6.7吨的自喷油流，成为湖北省第一口自喷油流井，不久在潭口的潭1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钟市油田。

喜讯传到北京，地质部发来贺电说，江汉平原打出石油，不仅具有重大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石油部和地质部都很重视江汉盆地的重大发现，认为这一



1965年9月27日，在江汉盆地潜江凹陷钟市构造钻探的钟11井首获自喷油流

发现不仅在我国中南地区找到了油气资源，而且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分布不均的历史。石油部决定，从广东茂名石油公司，玉门、新疆、四川石油管理局和大港抽调人员、设备，全面开展对江汉石油的详细勘探工作。1965年12月，以原江汉石油勘探处为基础，成立江汉石油勘探指挥部，下属8个地震队和11个钻井队，重点勘探王场、钟市、潭口和张港地区，争取发现更多的含油构造。

小型勘探会战显露江汉潜力

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建设起来，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后方。这里所说的“三线”是一个具有军事和经济地理含义的区域概念。当时将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后方地区的地理区域划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即后方地区。为了加快江汉这个三线地区的石油工业发展，改善国内工业布局，巩固国防建设，

1966年6月，石油部决定在江汉盆地开展小型勘探会战，江汉油田勘探指挥部机关从荆门沙洋迁转潜江周矶（今五七区）。

8月30日，石油工业部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成立，鉴于江汉油田保密和会战的需要，同时为纪念毛泽东发表的“五七指示”一周年，指挥部对外公开代号为“五七厂”，机关设在江汉一村（今五七区）。指

挥部下设地质调查指挥部、湘鄂西勘探指挥部、钻井工程处、地质指挥所等14个直属单位，是年有职工7900多人，技术设备1419台。

会战指挥部根据石油部关于“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上手就拿油”的指示，在9月至12月，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小型会战。在王场构造打出了18口高产油井，在沙市构造也取得新进展，控制了一定的含油面积和储量，由于沙市构造地质复杂，勘探效果不佳，只有三口井见到少量油流。

1967年开始，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项工作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各级干部群众忍辱负重，坚持工作，在潜江北部、江陵、枝江、沔阳等地进行了区域勘探，其间发现钟市油田和王场油田中有两口井分别获得日产201吨和533.5吨的高产油流。

到1969年上半年，共完成地震剖面1.13万千米，钻井185口，总进尺42.68万米，其中探井128口，获工业油流井53口，找到了王场、钟市、广华寺3个小型油田，控制含油面积11.86平方千米，还发现了沙市、陵2号、金家场、光明台、黄场、拖船埠等



油田详探时期职工办公和居住的芦席棚（1966年摄）

一批含油构造。同时建设了五七、红旗（今红庙）、“两厂”（今范新村）等勘探基地，路、水、电、讯先后接通，民用建设逐步展开，基地建设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江汉油田格局初步形成。这些成果令石油工业部领导和专家备受鼓舞，认为在江汉还可以找到更多、更大的油田，且还有13万平方千米海相地层油气地质条件好、勘探潜力大、具备了大规模会战夺油的地质条件。

12万会战大军集结江汉

1969年，中苏两国进入全面对峙时期。特别是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加速了双方的大规模备战。占全国原油产量一半以上的大庆油田，首先凸现在中苏前沿相互对峙的棋局上。中央加紧了三线建设的全面部署，地处中国腹地的江汉油田进入了毛泽东的战略视野。中央领导强调指出：“江汉是三线，战略地位很重要，很机动，支援华北、华南、中原战场很方便，所以江汉（油田）拿下来应急，战略意义很大。”

1969年2月，石油部军管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交《关于在湖北省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报

告送达毛泽东手中。第二天，毛泽东在书房召见周恩来，指示要尽快确定，部署工作。3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我们要在江汉地区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石油会战。一场特殊的会战拉开了序幕。

6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汉开展石油会战，并把它列入国家四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鉴于“文革”时期的具体情况，为保证会战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江汉石油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7月7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石油部军管会在武汉召开组织江汉石油勘探会战的会议，就会战准备工作、组织机构及会战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7月25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基建委军管会向全国发出《关于支援江汉石油勘探会战的通知》。8月1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的通知》，正式任命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任政委兼指挥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扬、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等任副指挥长。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于同日正式成立，机关设于潜江五七地区（今油田基地五七区职工大学）。不久，武汉军区决定，将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更名为“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

1969年10月17日，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的负责人向国务院业务组汇报工作。李先念副总理首先谈了周恩来总理对会

战工作的关怀和有关指示。会上，副指挥长康世恩代表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汇报了会战两个月来的进展情况及1970年的部署方案，并提出拟请国务院部委确定和解决的有关队伍、投资、设备、能源、交通、炼油厂厂址及汉沙公路改建等问题。这次会议基本上确定了会战规模及地质勘探、油田开发和石油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原则，并初步落实了有关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大会战，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说，他们到北京汇报工作的时候，去一次，谈一次。

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全国各石油单位及中央、地方有关部门抽调精干队伍，参加江汉石油会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来自大庆、胜利、新疆、四川、玉门等油田及有关单位的12.8万会战大军迅速集结到江汉地区。其中各石油单位抽调5.28万名职工参加会战，每4名石油职工中，就有一名被召唤到江汉油田。武汉军区2.5万余名转业官兵也赶来参战，还有国家部委1.2万余人和地方民兵3.7万人。到1970年底，会战人数一度达到12.89万余人。从全国各地调进114部钻机，设备10103台，各种钢材15.1万吨，木材7.3万立方米，水泥17.5万吨，采购资金达7.86亿元。这是自大庆会战以来组织规模最大、专业配套最为齐全的一次石油大会战。

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

会战时期，物资运输任务繁重，年货运总量达377万吨，货物周转量为1.63亿



1969年，武汉军区复转2万多名官兵参加江汉石油会战

吨千米，大批物资从武汉经长江、汉江、汉沙公路、汉宜公路及其他交通线路，运进油田区域和广大探区。短时期集中运输的物资数量很大，致使道路交通问题十分突出，若是遇到雨天，更是无法通行，大多是采取人拉肩扛的办法。建设炼油厂的机器和设备，是一支板车队从襄樊车站昼夜兼程抢运到基地的。

为了改善交通落后的面貌，会战中新建和改建了汉口长江舵落口码头、沙市长江五七码头、汉江红旗码头和新泗港码头；建设了全省第一条沥青混凝土路面公路汉沙公路；仅仅用8个月的时间，在东荆河上建成1100多米长的东荆河大桥等，大大提升了运输能力，会战物资得到及时供应，保证了会战的需要。

在众多参加石油会战的队伍中，有一支尖刀钻井队1202队，其前身是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警卫排，1953年在玉门组建为钻井队。他们曾经奋斗在祁连山下、天山顶上、嘉陵江边，又奔赴大庆油田屡创新功，与王进喜的1205队齐名，被石油工业

部授予全国“红旗钻井队”、“卫星钻井队”和“钢铁钻井队”荣誉称号。这次，他们来到江汉参加大会战。

1202钻井队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粮食和工具，徒步30多公里赶到井场。放下背包，立即修公路，平井场，进行开钻前的准备工作。钻机运到后，全队一鼓作气，一天就把13台设备和井架安装完毕，并抓紧时间开钻第一口井。

由于地质复杂，他们打第一口井时遇到由鹅卵石组成的砾石层，井漏十分厉害，井壁塌陷。为了堵漏，全队职工用脸盆、水桶整整端了27个小时的水。接着，在连绵的阴雨季节，井场的基础又塌陷，时任1202钻井队队长的屈清华等人带头背石头垫井场。整整七天七夜，填了陷，陷了再填，硬是用双手填平了泥潭，托起坚实的井架。

原地调指挥部263队队员回忆，他们每天都在危险中体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野外作业。队员们不仅背着生活背包与炸药包，还要抬着沉重的设备，

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荆棘丛生的湖区，非常吃力。野外工作是采用人工地震激发地震波，在九米深的井中爆破。有时候一声爆响，只见一亩大小的稻田翻了个底朝天，土块飞上天，被土块砸到头就危险了。若炸药包上浮引爆时就更加危险。若是在水中放炮，一声响后，水柱飞上天，水面上白花花，队员们很容易捞上几十斤的鱼，可以改善生活。

1970年秋季，在他们工作的一个湖区，湖里长满两人高的芦苇。湖边是厚厚的野草，一次芦苇被引燃，火势迅速蔓延，鸟儿都被烧死了，队员们侥幸躲过这场灾难。冬天里，北风鼓起队员们的棉袄，冷彻心扉，为了抗寒，队员们就用草绳系在腰间扎紧棉袄。此举被当地老百姓笑话，原来这里的风俗是在送葬的时候才在身上捆草绳。因为放炮的关系，队员们常常灰头土脸，放在工作包里的碗，也沾上泥土，又遇到附近没有水源，手也没法洗，只好用胳膊肘在碗里转一圈，权当是把碗清洗了，然后找两根细树枝当筷子，就吃上了。所



江汉第一口油井

以老百姓说他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勘探的。

钻井队和地质队的艰辛经历，只是当年参加会战真实状况的一个缩影。就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广大石油工人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铁人精神”，排除万难，书写了一篇“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华章。

会战中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石油勘探，探区主要包括，江汉盆地的潜江凹陷、江陵凹陷、新沟—老新地区、沔阳凹陷、云应凹陷，外围的南襄盆地、鄂西南地区、鄂东南地区、当阳地区、汉水—荆门地区以及湖南的桑植—石门地区、洞庭湖地区，勘探面积 15 万平方千米。其中江汉盆地 2.8 万平方千米，是勘探的重点地区。指挥部投入 2 个钻井团和 3 个地震营勘探潜江凹陷 2500 平方千米，投入 1 个钻井团和 3 个地震营勘探江陵凹陷 6900 平方千米，投入 1 个团和一个地震营勘探新沟—老新区 200 平方千米。

经过 2 年多的勘探会战，共完成地震剖面 2.9 万千米，钻井 1065 口，总进尺 198.87 万米，其中探井 553 口，其中获工业油气流井 145 口，发现张港、浩口、习家口、花园、丫角、新沟 6 个油田和 1 个气田，建成王场、张港、广华寺、浩口、习家口 5 个油田，发现了南阳油田、建南气田及熊家台、新农等一批含油构造和工业油流点。在潜江凹陷及建南构造还发现了丰富的卤水资源。

会战中初步建成了王场、张港、广华寺、浩口、习家庙等油田及配套设施，由于地下情况复杂，开采难度大，1970 年产原油 14.08 万吨，1971 年采取间断试采生产原油 23.7 万吨，到 1972 年，共开井 237 口，当年采油 13.73 万吨。会战中修建了从油区至荆门的输油管线，并形成年产 100 万吨原油的生产和外输能力。

江汉石油会战是我国石油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战，仅仅 2 年零 9 个月，就为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油田，初步形成了由地质勘探、油田开发、石油炼制、石油机械制造和科学研究等单位组成的综合石油基地，从而使江汉油田成为国家的重要石油工业基地。经过会战，不仅在江汉平原建设起一个初具规模的综合石油基地，而且揭开了中部地区找油找气的序幕，改善了我国石油工业布局。

1972 年 3 月，经国务院同意，撤销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随后 3 万多会战职工和 922 台设备、10 多万吨物资陆续调出，支援胜利、长庆、大港、华北、吉林、辽河等油田建设。1972 年 5 月，江汉石油管理局成立，隶属燃化部和湖北省双重领导，局机关设在潜江广华寺，所属机构由军队编制改为企业编制。江汉石油管理局兴办农场，开展农副业生产，建立城镇，安置职工家属，在东荆河以西的潜江境内逐渐建成了广华、向阳、五七、王场、周矶等小城镇，井架立于 5 个小镇之间，形成了一座松散的石油城，与潜江县城隔河（东荆河）相望。

江汉石油管理局不断拓展油气勘探领域，实施全面开发建设，发展炼油化工、机械制造，推进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实现稳定发展。1998 年 4 月，管理局划归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如今油田矿区和机构分布于湖北、山东、陕西、重庆、辽宁等省（直辖市）的 10 多个县（市），成为涵盖油气勘探开发、盐卤化工配套发展的大型国有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朝着“万亿方储量、千万吨油田、百亿方产量”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进。

关贤安，潜江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黄鹤楼下收藏“黄鹤楼”

◇ 朱汉昌

十年前，中央电视台《寻宝》节目走进武汉。三天活动中，一块清代三国志“黄鹤楼”人物木雕板，从4000件海选进入前100名，最终与60件一起定为“最佳宝贝”，在荧屏上“露脸”。这是我潜心多年收集、整理“黄鹤楼戏曲文化”系列藏品的一次佳绩。



家传影响情有独钟

我1949年出生武昌水陆街，至今仍居住于此，可谓黄鹤楼下的“老武昌”。受家庭影响，从少儿起就对画片、邮票感兴趣，发展到对武汉历史文化资料的收藏，已历40多年。其中，对武昌黄鹤楼文化情有独钟，数千件藏品已形成系列。

父母亲及兄长都爱京剧，家中留声机传出的唱腔也影响了我，至今保留着一张民国年间《黄鹤楼》戏曲香烟卡片，上面的戏装人物即周瑜、刘备、赵云，背景上印有“黄鹤楼”三字。听母亲讲，这是一出三国戏，东吴周瑜在黄鹤楼上设宴请刘备逼讨荆州，赵云按孔明的妙计与之周旋，最后走出黄鹤楼，安然登船返回荆州。那块亮相《寻宝》的人物木雕板，就是《黄鹤楼》剧情的展现：



“周”字旌旗和兵营帐篷，将黄鹤楼团团围住。

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临江，始建于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历代文人墨客登楼观景留下诗词无数，使它声名遐迩。戏曲《黄鹤楼》又名《竹中藏令》，最早可追溯至元代话本《三国平话》，是清代剧作者根据元人朱凯的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改编而成。较早由北京的京剧戏班演出，受到人们喜爱，先后有20多个地方剧种移植传唱，成为戏曲经典，从附录“《黄鹤楼》戏曲藏品一览表”中可见一斑。

《黄鹤楼》是汉剧、京剧常演的优秀传统剧目。1924年，在黄鹤楼下的共和戏院(今黄鹤楼剧场)，出现汉剧小生董金林和黄双喜合演《黄鹤楼》的趣事，有位票友当场送了一幅对联：“湖北戏院唱湖北戏，黄鹤楼下演黄鹤楼。”1931年《学戏指南》封面第二个是《黄鹤楼》，还有京剧大师梅兰芳在《黄鹤楼》饰周瑜的剧照。一些古老的剧种，如秦腔、湘剧、晋剧、豫剧、桂剧、粤剧、同州梆子、河北梆子、上党梆子、鹤峰南剧和浙江处剧、江西星子弹腔等均有此剧目。楚剧也曾演出《黄鹤楼》，那是新四军五师楚剧队在抗战时期。



传唱中外百年不衰

难得的是，故事源自武昌的《黄鹤楼》，传唱中外百年不衰。清同治皇帝和太监李莲英等一起串演过《黄鹤楼》，见于《清代伶官传》。英国汉学家司登得(1833—1884)最早将《黄鹤楼》戏剧故事翻译成英文，通过英文《远东杂志》向世界推广。至1984年9月，京剧大师程砚秋得意门生赵荣琛到美国纽约演出时，当地著名小生票友丁景源为之垫演了《黄鹤楼》，受到华裔的热烈欢迎。



多年来，我收藏了各剧种《黄鹤楼》剧本、唱本、曲谱，年代较早的有民国初年的共和梨园新戏、广西桂剧及武汉抗战期间的话剧。新中国时期主要有：1955年长安

书店的秦腔，1956年西安出版社的秦腔，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地方戏剧丛刊的汉剧，1960年江苏省地方戏剧院的梆子剧，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京剧，山西运城行署文化局戏研究室的蒲剧。特别是，江西星子县文化馆的星子弹腔剧种已诞生500余年，是当今稀有剧种之一。

到1980年代，《黄鹤楼》仍在演出，如1980年湖南省戏剧工作室的祁剧弹腔、1983年山西晋中文艺班的晋剧等。此外，还有这一期间中国戏曲学校教学研究室编印的教材、山西临汾蒲剧院青年团手刻的油印剧本。



此外，《黄鹤楼》的唱片、音像光盘也有所收藏，如高亭唱片公司的唱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像出版社的京剧、黄河音像出版社的豫剧、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晋剧、江西鄱阳市赣剧团的赣剧、浙江丽水的处剧等音像光盘。这些，都见证了《黄鹤楼》在全国的广泛影响。



清代著名相声演员朱绍文（艺名“穷不怕”）的相声代表作《黄鹤楼》，讽刺某人演唱京剧《黄鹤楼》时错误百出。1986年春节，武汉群艺团的董铁良、薛永年重拾这段相声，令观众大开眼界。与《黄鹤楼》同名的还有湖北小曲，1985年参加过全省曲艺会演。

然而，如今《黄鹤楼》戏曲多不为人知，甚至《黄鹤楼志》也没有收集。尽管《黄鹤楼》为全国20多个剧种演唱，武汉文艺



团体却没有更好地发掘和利用其文化价值。1980年代黄鹤楼建成后，有人就提出过这一问题。“黄鹤”百年归来，而《黄鹤楼》仍未重返舞台，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黄鹤归来“国家名片”

黄鹤楼在各类藏品中林林总总，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我收集到不少清代至民国与黄鹤楼相关的物品，有教材、年画、雕版、唱片、瓷器、银饰件、包装纸、广告、商标等。其中清代的儿童银饰挂件，由汉口银楼打制，图饰内容与那块清代木

雕板相似，四人分别是周瑜、赵云、刘备、鲁肃。

黄鹤楼的楼形图，清末由西洋人摄制并印成明信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被“共享”使用。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国领事馆借洋人在中国长江沿岸贸易通信为由，自印了汉口书信馆邮票，其中两枚印有黄鹤楼。

武昌巡道岭的一位卢绅士，自印本人住宅地名，以岳飞驻守武昌七年抗金为题材，在封上首印有“岳武穆黄鹤楼词”。这种涉及黄鹤楼的老信封，目前仅见此一例。而香烟、广告上印制黄鹤楼则屡见不鲜。1927年湖北省税务厅征收卷烟税，“卷烟吸户特捐”税票上印有黄鹤楼，仅使用一次，存世量非常稀少。还有中国大道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卡片、哈德门烟草公司的产品宣传册、印染公司和火柴公司的包装纸，都以黄鹤楼为元素。



湖北地方银行发行的纸钞上印有黄鹤楼，一般钱庄银号也印有黄鹤楼。当今市面上的请柬、证书、票证、烟酒商标、日用品

广告、工艺品上，出现黄鹤楼的数量达上千件（种）之多。



1985年，黄鹤归来，新黄鹤楼成为武汉的地标建筑。中国邮政1987年发行《中国名楼》，黄鹤楼登上了“国家名片”，《黄鹤楼大全张（50枚）》上有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向欣然的手迹。1986年6月，向欣然发表学术论文《论黄鹤楼的再创造》，其稿件及原设计稿样附本，都在我的收藏之列。

一座1800年前建立的黄鹤楼故事，由20多个不同剧种传唱，在全国独一无二。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昌人，我对身边这座古楼传承的文化，在多年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正在从事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我深切感到，要全方位弘扬“黄鹤楼文化”，不断刷新大武汉的这张亮丽名片，更好地吸引人们来登黄鹤楼、认识大武汉。

黄鹤楼戏曲藏品一览表

序号	剧目	省市	藏品
1	京剧	北京	高亭唱片、照片、早期唱本、VCD
2	京剧	上海	1936年上海华美烟公司赠《梅兰芳戏装锦集》画册页
3	汉剧	武汉	1960年《地方戏曲丛刊》唱本
4	豫剧	河南	唱片、唱本、照片、VCD
5	甘凉秦腔	甘肃、青海	唱本、照片、沈和中遗唱带
6	秦腔	陕西	唱片、唱本、照片
7	河北梆子	河北	唱本、照片
8	同州梆子	陕西	唱片、剧本
9	晋剧	山西	唱本、照片、VCD
10	蒲剧	山西	唱本、照片、VCD节目单
11	大评调	山东	照片、注解文
12	梆子剧	江苏	照片、剧情教材本
13	祁剧	湖南	照片、剧情教材本
14	湘剧弹腔	湖南	照片、湘剧艺人口述资料
15	星子弹腔	江西	照片、VCD、节目单
16	赣剧	江西	照片、VCD、节目单
17	川剧	四川	照片、文献、三国戏注解
18	桂剧	广西	民国唱本、照片
19	粤剧	广东	教学唱本、照片
20	北管戏	福建	照片
21	处州戏	浙江	VCD、地方志注解
22	灯影戏	青海	皮影幕影照
23	平剧	台湾	照片、刊物、剧本
24	木偶戏	福建	舞台艺人立木偶道具照片
25	鹤峰南剧	湖北	鹤峰地方志记载

朱汉昌，武汉第六棉纺织厂退休干部

汉口徽商与汉正街新安书院

◇ 王光

在闻名天下的汉正街，有一处与汉正街及老汉口血肉相连的古建筑——汉口徽商建造的新安书院。

明万历元年(1573年)，万历皇帝下旨，指定衡阳、岳阳、长沙、荆州各粮产区的漕粮，由湖南城陵矶改到湖北汉口交兑。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汉口又因其水运条件和能泊靠大吨位盐船的码头优势，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

漕粮淮盐，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正由于漕粮交兑和淮盐转运数额巨大，汉口迅速发展成为“四大名镇”之一。到康熙年间，汉口巡检司由汉水南岸迁至北岸汉正街驻扎，汉正街变身为汉口镇的官街。

明清时期，淮盐专卖大多为徽商把控，汉正街商人也大多为徽商，淮盐漕粮口岸改在了汉口，徽商及背后的徽州籍官僚集团应该功不可没。



新安书院遗迹



新安书院墙体

采用徽州祠堂规制建了十二年

汉口新安书院，又名“紫阳书院”“文公书院”“新安文会”“徽州会馆”。嘉庆年间翰林院庶吉士、汉口新安书院山长董桂敷，编撰了《汉口新安书院志》为之留下史迹。

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僧人长乐和尚云游到汉正街，在长堤附近的湖塘荒地搭草棚栖身弘扬佛法，吸引了不少信众，其中更多的是汉口徽州商人。后来，财雄势大的徽商集资买下地块，先后建了准提庵和三元殿，使之成为徽商议事和临时停放老乡棺材的寄厝之所。

康熙七年（1668年）十二月十三日，汉阳县知县给新安书院颁发了《准提庵三元殿执照》，从其描述的地产所有权内容，可以推算出准提庵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年）。如今，汉口现存的明代历史渊源建筑，只剩下汉正街这一处了。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今人和街和大夹街之间，一位名叫余大霭的住户卖房，徽商花了纹银一百五十九两买下，想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建一所新安书院，但所买房产占地面积太小。余大霭相邻的住户听说后，纷纷表示愿将房产卖与徽商建书院，借此待价而沽。徽商高价收购了十户，共花纹银一千二百七十三两，可谓大家气派。

新安书院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开始动工兴建，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最终完工，用了12年时间。其间，又陆续买下十四户房产计纹银一百五十九两，总共二十四处花了一千四百三十二两纹银。

新安书院的建筑规模恢弘，四方商民船只要到达汉口，站在船上首先看到的就是新安书院。它采用徽州书院祠堂规制，工匠全部从徽州招募，大青砖也在徽州烧制（砖上烧制“新安书院”正草隶篆七种铭文），木材石料大部分也从徽州购买，用船运到汉口大夹街近旁。

新安书院建成后，御书楼供奉康熙皇帝的御笔朱子六言诗碑，历代湖广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学台及汉阳知府、知县等

大小官员，到武昌、汉阳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新安书院拜御碑。

增建魁星阁号称“汉镇巨观”

雍正十二年（1734年），前工部尚书黄国材虽已离世三年，但在任广西布政使时的巨额亏空一案重新翻出，其后人为避免家族祸端，将汉正街大新码头周边一片铺面地产，作价银一千三百六十八两卖给新安书院。正好，徽州歙县人许登瀛署理湖南按察使司因公来汉口，到新安书院后倡议建魁星阁，并带头捐出俸禄号召大家捐款。

魁星阁建成后，许登瀛专门写了一篇记，并为新安书院题写了“新安津梁”匾额。其中，描述魁星楼的方位时，写到“背木兰，临大别，与黄鹤晴川楼阁相鼎峙，天地自然之文章具焉”。对魁星阁则具体描述道：“诺夫雕甍耸萃，绣阰流丹，吞山光而挹江濂，阁中之胜概无穷。”

关于魁星阁，《汉口新安书院志》和民国《夏口县志》均有明确记载。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乾隆六年（1741年）刻本《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第十四卷中“许氏阖族公撰观察邃园公事实”记载：“湖北汉口市镇旧有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昔时同乡人士欲扩充径路，额曰‘新安巷’开辟马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土人阻之，兴讼六载破巨万不能成事，以致力竭资耗而祭典缺然。岁仅朱子生辰一祭，盖已四十年矣。癸丑岁，公倡首捐输，得一万五千金，置买店房扩充径路，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安马头兼建‘魁星楼’一座为汉镇巨观。”

文中“马头”与“码头”同义，即汉口徽商的大新码头，2000年修晴川桥时占

用，正是魁星阁的原位置所在。

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新安书院老建筑逐渐老化，尤其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大水，整个汉口一片汪洋，书院被水淹数月，周围民房都倒塌，唯它安然无恙。汉口徽商在书院收容灾民居住，内设粥棚施粥送药，协助官府救灾，但大水对木构件还是造成损害。由此，湖广总督毕沅号召捐款重修，并亲撰捐修劝文“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

新安书院经过重修和不断扩建，已是一处宏伟壮丽的庞大建筑群，主要有：尊道堂、御书楼、报功祠、始建祠、半亩池、藏书阁、文昌阁、魁星楼和燕射轩，近圣居、启秀书屋、六水讲堂、主敬堂、愿学轩、致一斋、义学义舍等，成为了汉口标志性景观。

新安书院声名远扬，清代许多达官贵人、名士学者都到此拜访、讲学。康熙年间著名清官“铁面御史”、曾任湖广总督的郭琇题写“吾道中天”，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题写“斯文在兹”。历经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的“父子宰相”曹文植、曹振鏞父子，与新安书院一直有来往，曹文植为书院西厅题匾“六水讲堂”。乾隆年间状元吴锡龄养病期间题写“洙泗薪传”，湖广总督毕沅题写“福”。

铁柱现身“旅汉新安书院”铭文

新安书院历经战火到了民国，老建筑又需大修，但汉口徽商已不像明清时期财大气粗了，于1923年发行“旅汉新安书院建筑市场债券”，募集工程资金。传统徽派建筑的雕梁画栋，也因为财力所限而不能实现，建筑以实用为主，建成为新安市场。但

新安书院的文脉依然传承，汉口徽商在书院开办了“旅汉新安初级小学校”。

我收藏了一张1945年的“新安书院房租收据”，上面贴的印花税票上盖有“汉口新安书院”楷书骑缝章，同时收据上盖有“新安六邑旅汉同乡会之章”的方印，说明汉口新安书院一直与新安市场共同存在。



1945年新安书院房租收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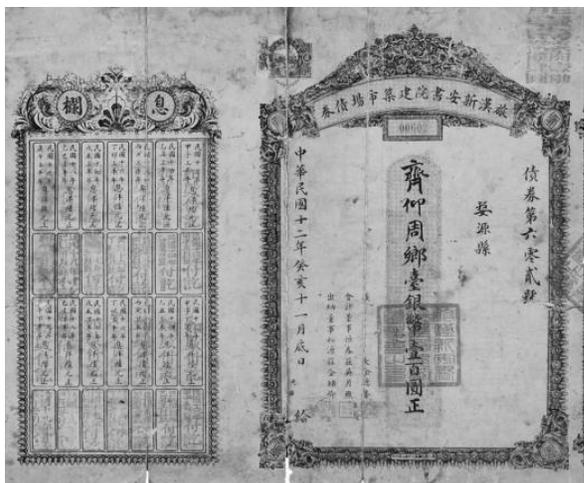
2017年11月27日，居住在新安书院的住户临街破墙开门面，发现墙内立有一根四方铁柱，铁柱一面铸有阳文“旅汉新安书院”六个字。为确保这唯一有新安书院全称的文物万无一失，我一面及时向汉正街办事处领导报告，一面现场全天通宵值守。第二天，硚口区文化局、硚口房地公司和汉正街办事处领导到达现场，现场商讨保护措施。后决定原地封存，还原砖墙将铁柱砌入墙内。为防止建材水分对铁柱增加锈蚀损伤，我用塑料薄膜将铁柱缠绕了九层，再用不干胶缠了三层，在上面写明封存单位和封存日期。



“旅汉新安书院”铁柱原地封存保护前作者留影

“旅汉新安书院”铭文铁柱的发现，为现存新安书院范围的确认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表明新安书院从大夹街延伸穿过人和街，直至准提庵的公寿前街与六水街相交，与新安街等长。那么，新安街是新安书院的甬道，应是毫无疑问了。新安街两边的建筑，从新安街2号到铁柱所在的38号，就是新安书院1923年发行债券重修的建筑，就是康熙三十四年至民国建筑一脉相承的延续。

在新安书院屏墙门前的新安巷，原来



1923年新安书院建筑市场债券

是一条青石板路，2003年武汉市社区883创建时因铺装彩砖将其埋在了下面。“新安巷青石板路”与“药帮一巷青石板路”（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样，是汉正街幸存的两条老青石板路。



1999年新安巷青石板路

新安书院2006年纳入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录，2012年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又纳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它承载着徽商与汉正街、老汉口的厚重历史，是大城根脉不可多得的历史实物见证。

王光，汉正街东片土地储备试点项目建设指挥部文物专班人员

在学中悟，在习中成

◇ 刘珍秀

人物名片：刘珍秀，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

学习《习近平用典》中的知识，“肯”“啃”两字于我而言比较贴切。“肯”读是态度，毕竟我们习惯了白话文，要搞清楚古代汉语用文言文表述的典籍来历、涵义等，尽管现在网络查询很方便，但着实需要坚持不懈。有时一句古文，甚至一个字的读音，得延伸查找N篇关联文章。

这种“小蜗牛”爬行速度的“啃”读，倒让自己弥补了中学阶段语文学习的不足，也使自己时常能从国际国内大事、国家大政方针中更好悟明道理乃至真理。现仅以学习《习近平用典》中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所涉三处典籍谈谈体会和收获。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问题，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管子》中的这句话，正道出民心与执政相辅相成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实践中明确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优势所在。翻开90多年的奋斗史，正因党旗上始终铭刻“人民”二字，我们党才获得了深厚的土壤与不竭的动力。

今天，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与行动。

我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夏家只有母子俩，身患癌症、缺少实用技能的单亲妈妈，性格内向、当时正住校读高二的儿子小夏。这个家庭，不仅在经济上、同时在上精神上都需要支持。

我联系市区相关部门为小夏妈妈看病求医，逢年过节给小夏妈妈送物资、去电话问候。小夏高考前我专门探望，送去书籍。2017年考上大学去遥远的新疆，及时为他筹集1万元学杂费，鼓励他安心上学。与单位驻村工作队员一起协调，使小夏享受到武汉上饶商会的助学金，大学四年和毕业后找工作一年期间，每年六千元。

小夏离家千里求学，我时常微信联系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学暑假时，我帮忙找实习工作。因没有自住房，小夏妈妈平常在餐馆打工时就近租房，假期母子俩只能回外婆家暂住。在“两不愁”“三保障”政策的推动下，夏家新房落成，我送去喜气洋洋的大红色五件套床上用品和春联，同时也送去祝福和希望。

“知识改变命运”，小夏大学毕业后在光谷一家银行上班。在与母子俩的通话中，我感觉他们精气神较之以往完全不一样，对党的感恩溢于言表，对现在的美好生活满满珍惜。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人类减贫作出巨大贡献。对比国外，我更深刻认识到国家独特的政治



2018年暑假，作者（左五）带小夏（左二）到武汉上饶商会汇报学习情况

优势和制度优势，“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我更加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自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面向未来发展好各项事业，巩固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正所谓“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习近平用典》为政篇）。习近平同志引用的这句古语，正体现了“广开言路、博采众谋”的协商民主原则。

在担任市政协工商联界别召集人期间，我大力调动本界别委员的积极性，动员大家

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发动民营经济人士和界别委员，踊跃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参政议政、远程协商、公共财政民主评议等活动。

2019年，组织“迎大庆、迎军运，民营企业家在行动”主题界别活动，为军运会圆满成功举办汇聚力量。同年，积极参加我市“少数民族助力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的重点课题调研，组织界别委员与来自西藏、新疆在汉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结对帮扶，为民族团结进步贡献绵薄力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团结一切有生力量，迅速组织界别政协委员捐款捐物，做好急需物资生产和配送，为防疫抗疫提供义务服务，主动下沉居家所在地社区等。全年共开展线上线下调研14次，及时反映民营企业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的意见诉求，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抓住中央和各部委出台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以及全联“知名民企湖北行”活动等契机，着力开展金融纾困服务，积极助推我市民营企业疫后重振。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工商联界别工作呈现特色化、制度化、精品化，并多次在市政协交流发言。2017年2月至2022年5月，市工商联界别在政协全会中提交立案的集体提案172件，被吸纳为建议案5件，大会发言6次。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习近平用典》笃行篇）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

在2020年武汉战疫中，市政协及时通过线上广泛收集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对防疫的“金点子”“好主意”，为党委政府“献良策”“建诤言”。去年市政协“老旧小区改造”建议案的办理过程中，工商联界别委员多人（次）到园林、规划、建设等部门了解政策，到不同老旧小区听取和征求居民意见，充分吸纳民众智慧。

今年市政协组织委员对接各区下沉街道、社区在“一线协商”，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等实事小事为切入点，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献计出力，实打实地推进“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这些具有政协特色的工作，都是“协商在一线”，充分吸纳民众的智慧、汇聚民众的力量，让民间高手支高招。这也是我们政协委员践行习总书记“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的真实体现。

“大厦需众材，海润要百川，事成集众谋，学成采百家。”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赶考”永远在路上。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不仅是鼓励委员多读书、读好书，深深地“钻进去”，更重要的是希望广大政协委员能从书中汲取精神营养，找到书中新时代的“黄金屋”“颜如玉”，轻盈地“跳出来”。更希望广大委员自身并带动所联系的界别群众，满怀信心、积蓄能量，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展示新面貌干出新样子再出新成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学”与“习”永无止境！

数字传承文明 阅读创造未来

◇ 陈 曲

人物名片：陈曲，汉南区政协常委、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将读书作为履职起点

2017年，刚刚加入汉南区政协的我还是一个菜鸟，并不知道如何建言献策。我结合自己在本区工作几年的所见所闻，感到武汉经开区主要经济指标虽然连创新高，但极高程度地依赖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重工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缺乏多元抓手。恰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再版发行，我决定从书中汲取理论精华，寻求解决思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中提到：“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

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我读后由衷感到，要实现未来若干年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必须鼓励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腾飞。于是我向汉南区政协提交《关于营造创新氛围，以人工智能引领经济发展的建议》提案，提出：（一）进一步搭建平台，筑巢引凤育凤。除了引入BAT等龙头企业，更应着力引入和培育人工智能生态链关键中小企业，尤其初创科



2021年12月参加汉南区第十届政协第一次会议

科技企业。(二)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人工智能创新科技企业,扶持政策门槛要尽可能低,要更灵活。(三)配套的人才政策要进一步完善和接地气,促进招才引智。(四)从硬件、软件上加强“全民教育”,通过文化场馆的建设运营、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文化产品的引入推广,营造一个全民学习的文化氛围,打造学习型社会。

这篇提案得到区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办理,被列为当年的重点提案和优秀提案。很快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调研,出台《黄金三十条 1.0》扶持政策初稿,希望推动区内创新创业。区里组织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集体协商,对初稿提意见和建议。我提出,这个政策目标明确,但具体条款还是缺乏对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了解,是以搞工业的思维在搞科创。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基本以人力为核心资源,几个人几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创业,不需要大面积租赁厂房,创业初期也不可能有多少纳税额。因此,以“厂房面积”作为扶持条件、以“纳税额”作为扶持依据,是不适合中小型科技创新企

业的。区政府对我和其他几位委员的想法和建议给予肯定,迅速修订出《黄金三十条 2.0》。

经过几年的运行和修正,2021年武汉市经开区又发布了《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创造发展助力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33 条措施》(简称“车谷科创 33 条”)等相关政策,区内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新兴企业积极入驻,数字产业快速发展,区内创新氛围日益浓厚。

数字技术服务全民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

数字出版是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我所在的企业中文在线集团,是国内数字出版领域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以“数字传承文明”为企业使命,深耕数字阅读行业 20 余年。不仅积累了海量的数字文化资源,提升了数字化加工技术,更积攒了丰富的数字文化建设经验。我们所打造的各类云端平台在全国数千所学校、图书馆、企业、机关、部队、社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以“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服务模式,实现了“互联网+”时代下的全民阅读创新。

去年 3 月,我们的服务邮箱收到一封自称“69 岁老童生”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提到他获得书香荆楚阅读卡后,“眼花的我特地上网买了一台二手平板,这些年

阅读卡让我获得了好多阅读快乐，谢谢”。由于服务到期老人来信咨询如何继续使用，我们第一时间上门为他解决了问题。老人曾是大冶特钢厂的一名管理干部，平生最爱读书，平板电脑里存着他下载的《PS高手炼成记》《航模飞行模拟器》《傲慢与偏见》等几百本书。他说：“读书能够丰富自己，更重要的是读书能让我的生活质量有大提高、大变化和大升华。”老人的肯定鼓励着我，要一直在宣传、推广阅读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学习、积极思考、与时俱进，利用这些书中所得积极议政履职；同时，作为一个深耕数字出版领域十多年的从业者，能借“委员读书活动”的机会把优质的内容和读书体会，积极分享给更多的人。

近年来，我所带领的团队助力全国多地的“书香政协”建设，通过搭建网络化阅读平台，政协委员及各界别群众都可以通过各类数字终端，畅享海量正版的文化资源。2020年，汉南区政协打造的“书香汉南政

协”数字阅读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突出政协特色，专门推出“政协学习专栏”，委员们人手一张“书香政协数字阅读卡”，可随时随地享受来自云端的经典阅读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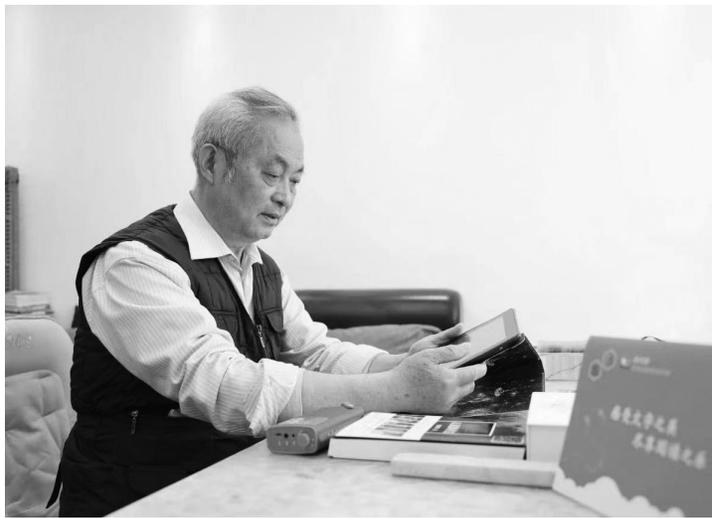
今年7月，全国政协书院联合国家图书馆、光明日报社共同推出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主题读书暨“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活动社会读者群启动仪式，在全国政协机关举行。此次活动，全国政协书院依托我公司的资源和技术，搭建“全国政协网上书院”平台，并同步上线“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线上主题阅读专栏。目前，“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五个单元读书群里的阅读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读后感在群内积极交流。

从内容资源上，我们取得中宣部《新时代新经典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系列丛书的正版授权，并向各政府部门、政协机关、企业学校、城乡基层等全领域发布，全面助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能为这项伟大的事业作贡献，我感到非常自豪。

关心下一代读书人

今年我们企业赞助和冠名“中文在线杯”2022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大赛。这是全国高职院校针对信息素养教育开展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竞赛，每年有千余所高职高专院校参赛。通过这项工作我了解到，过去几年的比赛从培训到试题，都侧重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培养和考察。

记得《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



2021年3月读者“老童生”家中送阅读送关爱

述摘编》中提到：“现在，网络空间情况复杂，主流当然是好的，但也有很多杂音噪声，甚至有很多负面言论。这个战场很重要，对青年人影响力很大，很多青年都是在网上接受信息的。开展网络斗争、加强网络管理、弘扬网上主旋律，这项工作大家都要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阅读，是跨地域、人群、时间、空间，千百年来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们在网络上的各种碎片化、多媒体的信息读取行为。人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亟需提高对信息的辨别能力，激浊扬清，这与倡导“读好书”是一个道理。

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都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信息检索能力远胜于“70后”“80后”。因此，对他们信息素养的培养，应该比基础的“检索技能”理解得更广、更深。既要对学生开展信息检索、操作能力的培养和教育，还要开展信息道德、信息文明教育，使其具有正确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能够判断选择健康有益信息，抵制有害信息。



2022年9月，汉南区政协“喜迎中共二十大 干出政协新样子”读书分享会上发言

因此，在全国大赛和各省级大赛的工作大会上，我作为代表发言会重点讲我的这些理解和体会，积极宣传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强调的以正确价值观为基础的信息素养培养方向，并以命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加强学习。

未来，我还将强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从知识中汲取“政协力量”“创新力量”，把所学所得转化为建言资政的“委员声音”；在自己读好书的同时，发挥我所在企业的资源优势，强化读书阵地数字化建设，从平台建设、管理统筹、服务效能、资源配置等方面着手，努力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立足企业、产业，不断释放数字创新活力，推动数字创新创业繁荣活跃，为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献微薄之力。

传承奋斗基因，续写新时代烘焙风云录

◇ 陆伟（口述） 南方（整理）

人物名片：陆伟，上海人，武汉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算起来，我和团队到武汉创办仟吉已有17年。17岁，对于人类来说，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到了选择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迅速扩张、尽收眼前红利，还是深耕专业、筑牢长远根基？党的二十大关于“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目标擘画，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选择。仟吉将不忘初心，专注烘焙，用美味推动人类对生活的热爱，助力人们实现从美好生活向幸福生活的跨越。

前3年干得苦，后3年成“网红”

我从事烘焙业很早。1992年，我岳母宋爱洁和我及家人一起在襄樊创办了“妞妞”西饼企业，妞妞是我女儿的小名。这个品牌现在发展得依然很好，在襄阳家喻户晓，在省内外也有200多家店。

“仟吉”是我2005年来武汉后新创的品牌，当时正好遇上武汉大发展，人们对面包的需求升级，要求有更好吃、更新鲜、形象更好的烘焙店出现。仟吉的店面、产品、包装都很好看，放到现在叫“网红”，而且

现烤面包当天卖不完都丢掉，这种方式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但我们用新鲜和对食品安全高要求的经营理念慢慢得到了消费者信任。

虽然我们前3年干得很辛苦，仅丢掉隔夜面包一项就亏损1000多万，但后3年我们逐渐在武汉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经营到第5年，我们又到长沙、郑州、合肥开店，从一个城市品牌成为区域品牌。在武汉的第一个10年，我们从汉口3家店发展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安徽（合肥）、河南（郑州）、河北（石家庄）、广西（南宁）六省400多家门店。最近几年，我们通过搭建外卖平台、微信小程序、开设淘宝和京东旗舰店、抖音直播等线上渠道，销售有了新的突破点。

绿颜色的招牌，产品设计、包装比较重视颜值……大家日常也许与“仟吉”品牌交互过，可能有这样的感知和认识。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近期我们对品牌定位进行了调整，从“味觉空间的情调家”变为“自家农场新鲜烘焙”。前面这句是我们10年前提出的，突出时尚，后面这句突出食材的新鲜好吃。同样是回答“仟吉是谁”，宣传侧重点因时代需求变化而变化，但我们对食品美学、颜值经济的追求一直没有变，可以说一脉相承。

从我个人因素来讲，我是学设计和绘画的，喜欢艺术，喜欢美的东西。经常一直画一直画，画到觉得好看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好看？我的理解是：过去人们主要以文字为媒介进行视觉传达，现在更多地以图形为媒介进行视觉传达。视觉新时代，美学对人的生理、心理都有更大影响。创造视觉美好、心灵美好的产品，是食品工业的大方向。



田园烘焙

来武汉前，我在襄樊的创业品牌——“妞妞主题音乐餐厅”，也属时尚先例，全国有名。那是1997年左右，开西饼店第5个年头，我到上海参观学习，受到台湾人开“红帆”餐厅的启发，回来就把餐饮和面包结合起来，开起了主题音乐餐厅。餐厅装修讲格调，引入乐队，提供煲仔饭。襄樊的年轻人觉得新鲜、时尚、文化、适合社交，很喜欢来。第二年，在荆州开了第二家主题音乐餐厅。后来不少朋友回忆，自己吃的第一份台湾卤肉饭，就是在我家餐厅。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能这么潮，其实和我第一次创业做乐队有关。我1986年从湖北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之后进了化工部第六建筑公司搞宣传。业余我喜欢弹吉他、唱歌，和几个同学找场地、组乐队，开舞厅。演出许可证非常难办，我们求亲靠友想办法。1988年，几个年轻人还真把舞厅给开起来了，乐队是自己的，灯光用的汽车灯，彩球、泡沫、镜子打碎当装饰。舞厅是个新生事物，当时是2块钱一张门票，开张第一天就收到了70块钱，大家那个高兴！后来我去开面包房、开餐厅，还把当年的乐队请回来表演。

我的女儿很羡慕我有这样一段创业经历，我自己也很珍惜和自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梦想就要去行动，无论成功失败，都会一生受益。

我开餐厅的同一时期，“上岛”、“秀玉”创始人进入餐饮业。我们进入武汉前后，“周黑鸭”、“良品铺子”也在崛起。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

回到原点，烘焙“有灵魂的面包”

“有灵魂的面包，美学上过目不忘，力学上层层分明，味觉上超越想象”，我一直觉得，哪怕一块最普通的面包，也值得用一颗虔诚、纯粹的匠心去打造，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大自然给予的食材，不辜负任吉与消费者之间的缘分。

我们到海内外烘焙先进市场学习，邀请行业大师定期来培训指导……不是说，只有手工面包才能体现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指要有“把事情做好”的专注和执着。要创造美味，你得痴迷、热情甚至挑剔，不断探索、发现。

我们现在主打“自家农场新鲜烘焙”，与10年前流转土地种草莓有关。做蛋糕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草莓。它是偏碱性食物，对身体比较好。但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发现大多数草莓会使用膨大剂，而不是用蜜蜂授粉，想要找到安全、放心的好食材太难了。我们就想，能不能自己种？我们2012年流转了黄陂六指761亩地建基地，选用日本红颜草莓品种，在甘肃海拔2000米的地方培育种苗，然后移栽回来，用自然农法种植，不用膨大剂，这样草莓品质更安全、口感更好、酸碱度也更合适。

一开始种草莓很辛苦，但顾客欢迎，

越种越有兴趣，品种也增加了，现在农场已经变为任吉的特色和符号。我们用农场自产食材研制适合客户口味的馅料，往食材创新的更深层次探索。就像一个家庭，妈妈很会做菜，不断地为家人做好吃的。比如秋天主推火龙果、南瓜，冬天、春天主打草莓。遵循自然法则，倡导食在当季。

我觉得，好的面包是从土壤里种出来的，面包的好味道，与基础的食材、馅料、烘焙方式息息相关。只有坚持初心，回到烘焙的原点，用自然成熟的好食材，才能烤出好面包。所以，未来我们产品设计的方向，就是用更新鲜的食材，提供更放心的产品。未来，我们还要依托湖北武汉鱼米之乡、食材丰富、可就近供应的优势，做深烘焙供应链，不仅自供，也为客户配套原材料和半成品，让任吉农场出产的新鲜馅料为更多人服务。

最近，我们在武汉天地、国金越秀开了两家生活体验店，除了卖产品，也提供场所和机会，让人们交流烘焙心得，增加互动。我们希望，人们通过品尝和互动，通过味蕾感受自然好食材，在快节奏的都市中培养慢生活理念，树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念。

美妙的食物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也能传递快乐和情感。从这个意义讲，烘焙行业是一个“幸福的行业”。任吉会一直聚焦这个有助于提升人们幸福指数的行业和领域，沿着烘焙的方向做深做透，继续把品牌做大做强。

站稳发展“临界点”，深耕华中区

今年夏天，有媒体研判“烘焙界的任吉现象”，问我是否会趁势而上，把店面开到北上广。我说，我们不仅不去北上广，我

们在既有市场也要适当放慢脚步。

从2005年进入武汉开出第一批店面，迅速增加到现在的400余家，仟吉的前端扩张比较快，但后方的中央工厂、物流仓储等资源匹配速度，已经跟不上店面扩张速度，在这个点上如果再扩张就会出危险。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清醒，抵御住成功与现实利益的诱惑，控制住快速发展欲望。

这些年，我们做过不少选择题：加盟还是直营、坚持主业还是多元扩张等。我们做到第5年的时候，好多客户、朋友都想来加盟。我们内部产生分歧，有合伙人也说，可以加盟呀。我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搞加盟。首先加盟，得让加盟商赚到钱，而我们供应链很多时候还无法保障供给。等有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供应链建好了，再发展加盟商也不迟。

看到同期发展的品牌陆续上市，我们同样面临上市与否的思考。我们已形成一套完成的产业链，一二三产紧密结合。闭环管理链条相对复杂，有很多挑战要应对。等我们练好了内功外功，我们不排除上市，关键是要水到渠成。我创业30年，今年55岁，已经不是很年轻了。但相对来说，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企业的发展有一些坚定的想法。总体上，我们选择稳健发展，希望能长长久久，行稳致远。

未来三年的重心，依然是聚焦产品研发，将工业智能化与智能化管理相结

合，深化完善产业链闭环。具体包括：上游扩建中央工厂，计划3年内完成第二期和第三期建设，中游完善物流、仓储系统，优化信息化、标准化操作，下游对门店进行品牌升级。

安全工作则是常抓不懈的重中之重。仟吉在黄陂武湖的中央工厂很早就通过了质量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认证。现在，我们从合规性审核、原料品、添加剂、工艺规范与卫生、异物的管控、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器具环境、标识标签、储存运输各环节入手制定方案，预防为主、有效管控、持续改进，开展全面的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并从设计开发、采购、生产、物流、销售服务全流程进行食品安全风险防范。

因为饮食习惯不同，烘焙业在国内一直是小众，本就时刻处在危机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品牌老化，年轻人就会抛弃你。所以我们一直对市场上各种变量保持着警惕，保持着动态研判。我在和团队交流时常说，唯有持续创造让顾客欢喜和感动的产品，我们才有存在价值。

对于品牌，我希望专注主业；对于企业，我希望稳健长久；对于员工，我希望为他们



未来升级 仟吉店

营造一个好的氛围，提供更多施展才干的舞台。仟吉会带着这三个目标，更加坚定、更加专注地走好未来的路。如果能为社会、为顾客、为员工创造更多美好，我作为创始人心里才踏实。

展望前景，虽然有疫情等影响，虽然有现实问题要解决，但我们对烘焙行业依然充满信心。按照日韩标准，中国的烘焙市场目前只开发了10%，还有大片蓝海。待仟吉跨越了发展临界点，会为更多人带去美妙的味觉体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光荣。

传承家国情怀，续写新时代烘焙风云录

我开始创业经商，有偶然性，也有来自家庭的影响。我家在襄阳，但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浙江宁波诸暨（现诸暨归绍兴代管）人。父母每次回去探亲，襄阳的同事都会请他们帮忙带东西：大白兔奶糖、上海服装……跟父母去探亲的我，能感受到城市之间的差异。从小我就有个感知——有差异化的地方会产生商机。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承包工厂，代工上海服装。后来做音乐餐厅，思路也来自上海。

我的父亲是上海浦东农民，15岁时在浦西一个宁波老板开的电焊铺子里当学徒。初解放，铺子公私合营，父亲报名去抗美援朝一线。人家没批准，说你是技术工人，应该去更重要的地方建设祖国。热血澎湃的父亲作为上海产业工人的一员，报名去了大西北，落户到条件非常艰苦的兰州。

我的母亲1943年出生在诸暨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全家都是读书人。母亲的爷爷兄弟四个，其中两位与鲁迅、范文澜是好友，鲁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其中一位，我们叫“四爷爷”，做过民国时期的浙江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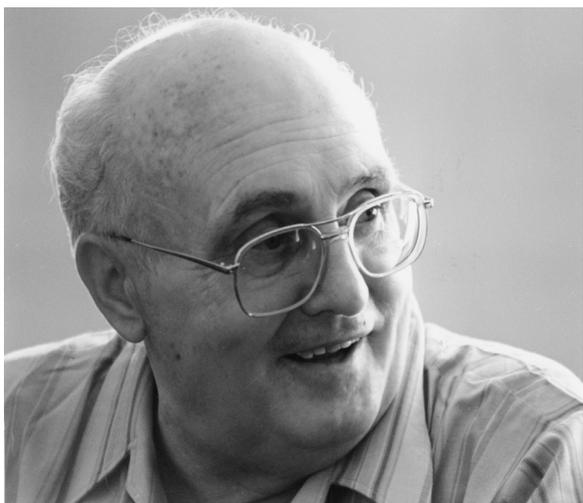
教育厅厅长，抗战胜利后参与收复台湾，任台湾国立大学校长，解放后留在大陆，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另一位，是绍兴学校的校长，也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是中医伤寒专家，当时资助过农工民主党，反右时受到迫害。我母亲因家庭成分不好，初中毕业后无法在当地就业，恰好有个同学在兰州，她受邀到兰州后认识了我父亲。结婚后，我父亲在兰州，母亲在诸暨，两地分居多年，直到1969年化工部在襄樊设立第六建筑公司，父亲调来，一家人才在襄阳团聚定居。

我是一个喜欢记录的人。今年夏天，我带女儿回了一趟诸暨老家，看了我母亲出生、居住的地方，也看了家族生活的环境，都记录了下来。亲友们也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希望爱国、向上、创业、奋斗的家族文化能一代代传承。

仟吉有一个团队也在梳理各种资料，为了留下企业发展的完整记录，载体有胶片、纪录片，有文字，也有我画的画儿。我记得，10年前，武汉媒体曾发表了一篇“武汉烘焙风云录”，里面有仟吉，也有同行们，展现了整个行业抢抓机遇的眼光胆识、迎难而上的开拓进取、波澜壮阔的创新奉献。仟吉发展史是行业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记录，传承这个行业始终团结奋斗的基因，为续写新时代的武汉烘焙风云录，增添可资佐证的史料。

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 曹小麓



格里希 1985 年 5 月在武汉 但频摄

我 1969 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 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 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 35 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

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 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用千分尺考核检验科长

1984 年 9 月，格里希来厂，我从事专机设计并没有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但不断传来“洋厂长”如何严厉的消息。特别是他提出开除总工程师赵海音、检验科长张福生，简直是石破天惊。因为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大家吃着大锅饭，被厂长开除闻所未闻，全厂职工都紧张起来。

当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多，一位厂领导到我办公室通知下午下班后，格里希要对我进行考核，要我赶紧到厂计量室突击学

习一下使用计量器具。这一天，我的心情十分忐忑，不知道参加考核的有哪些人，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考核我，如果考核不合格会不会被开除？越想越紧张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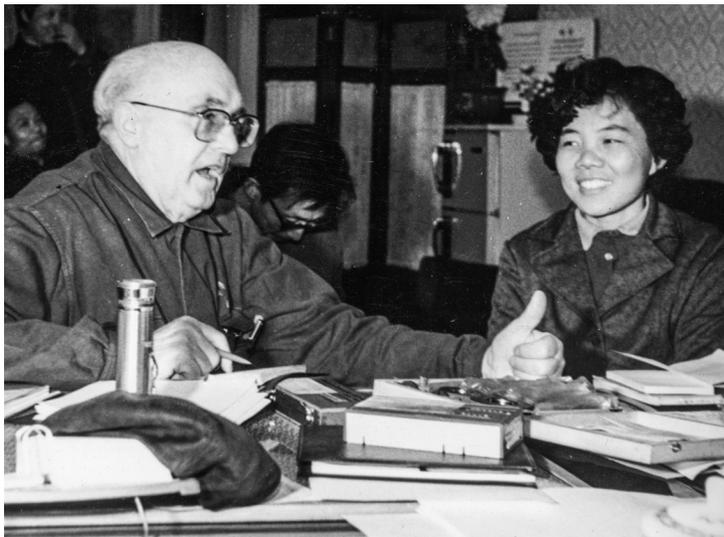
下班后，我来到厂设计科所在的小楼，只知格里希在二楼有一间办公室，就站在走廊上等待考核。我一个人在那儿，一些问题反反复复在脑海搅扰，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也不敢去吃晚饭，担心格里希随时出现。直到6点多钟天黑了下來，格里希和翻译余维浩、武汉市“四人小组”一位领导及几位厂领导，从车间回到小楼，他们同样都没吃晚饭。

这时我看到设计科三位工程师，猜想他们也是参加考核的吧。待格里希坐定，“四人小组”的领导说，三位工程师配合格里希工作，拟担任中方厂级领导。格里希同他们进行了简短交流，然后考核就轮到了我。

当我听到“四人小组”领导介绍说，准备推荐我担任检验科的工作时，心中大吃一惊。全厂都知道格里希非常重视质量，刚刚开除检验科长，检验科又是他亲自主管，把我调进检验科，那不是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吗？

来不及考虑，格里希表情严肃开始考核，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量具，他拿起一个校准光滑环规和一把内径百分表，要我测量和读数，我顺利完成。他又拿出几把外径千分尺，分别锁死，要我将读数写在一张纸上，每读写一个就递给他检查一次，只听到他说“ya、ya”。

最后，格里希拿出一把从德国带来的内径千分尺，锁定位置要我读数。这种内径千分尺，在我们厂从未见过，一旁的厂领导



1984年11月，格里希考核后对作者伸出大拇指

紧张不安，有人远远瞧了一眼就想传递答案给我。格里希示意不许说话。我仔细观察内径千分尺，虽然没见过，但理解千分尺刻度原理，快速分析出它的刻度正好与外径千分尺刻度相反，那么应该反向读它的刻度，写下了正确读数。格里希看过，一边说“OK”，一边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格里希来厂后发现了许多问题，常常对劳动纪律散漫、生产管理松弛、产品质量低下不满意，甚至发脾气。这次他伸出大拇指，让在场的领导舒了一口气。我在笑，却笑得有点羞涩和紧张。

这时，我听到“四人小组”领导在问格里希，对几位考核对象的工作如何安排？格里希回答三位设计科工程师先跟着他工作几天，他需要观察他们的工作态度；对我则同意到检验科工作，同时提出三条要求，大意是要认真对待质量检验，深入生产一线关键岗位，控制零件质量，不希望在办公室里看到我。

离开格里希的办公室，繁星满天，我仍感觉恍惚，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我就这样被推到风口浪尖了吗？我该怎样配合格

里希的工作？我原本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设想完全被打破，该怎样以工作为中心又能兼顾家庭呢……思绪万千，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没有劳资科调令，只有“洋厂长”一句话，我就到检验科上班了。三天后，格里希任命卢工程师担任检验科科长，文工程师和我担任检验科副科长，大力加强检验科工作。

送给我德国游标卡尺

1984年，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厂里的车间主任、科室科长几乎都由50岁以上的男性老工人担任。尽管党中央对选拔干部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但人们的观念还固守在旧的思维模式里。听说格里希任命了一名年轻女工当检验副科长，人们议论纷纷，开始“人肉”我。一起底，原来只是一个热处理的女工！最盛行的传言是，“格里希提拔了一个热处理青工，连游标卡尺都不认识，还当检验科长？”

那年我已36岁了，现在看来并不年轻，但当时还被看作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我也特别理解那些传言，因为热加工和冷加工的确有很大不同。

按照格里希的要求，我每天都直接到机加工车间工作，和检验员一道控制零件加工质量，防止出现批量事故。格里希每天都会出现在大件加工车间，他非常重视曲轴、凸轮轴磨削加工质量。遇到我，他耐心告诉我零件表面粗糙度对柴油机整机寿命的重要性，亲自示范怎样用带有刻度的放大镜检查零件质量。为了方便我的工作，他专门从德国先后带来两个放大镜（一个带有刻度）送给我，要我随身携带经常使用。

那时候，我国的表面质量标准是光洁度，光洁度级别的判断是用标准块比对。可是，标准块只有一套在厂计量室，车间生产一线的检验工，只得完全凭经验、凭视觉判断光洁度是否达标，检验方式确实不科学。

格里希有一个蓝色手提工具箱，装着一台从德国带来的表面粗糙度检查仪器，到车间自己测量曲轴、凸轮轴的表面粗糙度。看到我和检验员很感兴趣地围观，他就手把手教我使用，讲解表面粗糙度值与光洁度的对应关系，要求我每天都要用仪器测量，并将结果上报给他。他把这台仪器交给我，后来我把仪器交给计量室，要求曲轴、凸轮轴检验员每天抽样送检，形成必检项目，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为了方便我控制零件加工质量，格里希又送给我一把从德国带来的数字显示游标卡尺。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数显量具，这种游标卡尺好先进，连盒子里垫着凸凹不平的泡沫塑料，都觉得真高级啊！



格里希在任期间，送给作者的带刻度放大镜和5倍放大镜

格里希在大件加工车间巡回，发现检验员在测量孔的尺寸时，用千分尺校对百分量表，结果有较大误差。当时厂里只生产S195柴油机，生产的零件孔径是固定的。

格里希找来工具科长，要求他按产品尺寸订购一批校准光滑环规，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这批环规很快投入使用，我们立即把它列入了计量器具名录，建立了定期检测制度。

对有良好职业道德、认真工作的检验员，格里希几乎是手把手教，不厌其烦地讲解。对那些把检验岗位当作“养老”的检验员，他就十分愤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

大件加工检验组没有专门检验室，是在机体加工线的末端放一块平板，质量测评就在粉尘飞扬的车间进行。格里希感觉环境对测量数据有影响，他一方面安排在最先进的坐标镗床上检测机体各孔坐标，一方面要求安排一个专门检验室。很快，我们搬进了三车间大门旁的房间，月度大件质量测评的条件有所改善。

我作为检验管理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亲手检测控制零件质量，对检验人员工作作风的转变，对机加工零件的质量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大家看在眼里，那些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1985年4月，格里希在铸造车间和工人一起查看机体型砂质量

在车间，我总是到中班生产比较稳定后才离开。下班后，我还借阅有关柴油机构造和理论的书籍，研究S195柴油机的全套图纸，对各个部位的配合尺寸进行分析并牢记下来。我也查阅了所有机加工零件的工艺卡，对加工工艺过程和要求了然于心。这些都是做好检验工作必备的条件。我体会到，检验科长远不是人们想象的会测量会用量具就能胜任，而是如格里希要求的那样，需要有全面知识，并能深入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

邀请攻关组共进晚餐

1985年4月14日，厂领导班子调整，卢工程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工程师担任了负责销售的副厂长。

5月，我被任命为检验科长，直接在格里希领导下工作，每天早晨要参加他主持的半小时碰头会，汇报产品质量情况和整改进度，管理140多位检验员和9个车间及计量、外协等12个检验组，协调生产、销售及车间科室关系……责任重大，任务繁重。

前期的工作经历，的确让我看到产品质量的许多问题，职工质量意识薄弱，劳动纪律涣散，设备仪器又落后，随时都会出现各种不可思议的质量事故。例如，机体与水箱的连接螺孔，为了防止水渗漏到机体内部，是不允许钻穿的，但由于操作工和检验员责任不到位，出现了大批量钻穿的事故，而且是流入到装配线才被格里希发现。再例如，机体上的缸盖螺栓孔，加工工具机用丝攻已经磨损却没有检查，

盲目加工的大批机体流入到装配线上，缸盖螺栓成批量不能装进机体的螺栓孔，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检验员的工作岗位曾被看作是舒服的“养老”岗位，有中层干部家属，有托关系走后门来的，也有生产线不好管理的刺头，有临近退休的老工人。而格里希对检验员的素质要求是：受过职业培训，精通计量器具使用，勤奋而有责任心的优秀职工。

所以，我走上检验科长岗位时感到压力很大，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更害怕空中随时响起的“广播找人”：“检验科曹小麓请马上到装配车间总装线上去。”听到后，我的心往往如坠深渊，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重大质量问题，急急忙忙放下手里工作，加快脚步赶往总装车间，准备接受格里希暴风骤雨般的震怒。有时人在铸造车间或机加工车间，因噪音太大没有听见，被在场工人提醒后，恐怕格里希等待时间过长更加生气，我更加焦虑不安。

越是担心，越要出事，当上检验科长没几天就碰上一件。

为了保证柴油机的使用寿命，针对整机清洁度，格里希做了大量改进工作。在铸造车间更新了泥芯盒，率先给泥芯刷石墨粉；型砂的操作到现场调研指导，甚至在沙尘弥漫的清铲岗位亲自给操作工人和检验员示范，讲解清铲后的机体怎样才算达到了质量要求。可第二天，他再到清铲岗位检查，工人没有按他的示范操作，依旧马马虎虎了事，机体毛坯内部的跨砂也没有清理干净。更可气的是，检验员远远坐在车间外喝茶抽烟聊天，格里希到了还坐着不动，甚至发生顶撞。格里希对不负责任的检验员不能容忍，非常愤怒，宣布了开除他的决定。

这一下，检查员这才慌了，到处找我

去为他求情，下班了也不回家，跟在身后承认错误表示改过。我找了厂领导，请他们出面做工作，格里希同意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检验员也履行诺言，完全变了一个人，认真把关，使铸件的清铲质量得到保证。

对于检验员的素质，在格里希担任厂长初期，就要求每天进行半小时的测量训练。因此开展技术练兵，组织测量竞赛，严格进行考核。每周，由我给检验员上一次课，上课时间要上报格里希，他会不时带着翻译来听课检查，不能有半点虚假。



1985年1月，格里希在装配车间用磁铁棒和手电筒检查正在装配的柴油机

在格里希的要求下，全厂检验员穿上了专用的红色检验工作服，在生产线上巡回时有了权威性，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能坐着不动，随时接受大家的监督。

格里希常常交一些质量攻关任务，印象深刻的一件是：他发现不清洁的机油泵装在柴油机上，通过机油把铁屑等污物直接送到曲轴颈和轴瓦之间，造成轴瓦拉伤。碰头会上，他把清洁机油泵的攻关，交给了工艺科黄科长、总工办胡工程师和我。

我们和总装车间副主任一起，选择了几十个机油泵，亲自拆卸，逐个清洗，安装成机油泵总成再次认真清洗，做上标记。我

们认为工作很仔细，应该万无一失了，才放心离开总装车间。第二天上午，“广播找人”响起，我们匆匆赶往总装车间，格里希等在那里非常生气，声音很大，语速很急，严肃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认真清洗？把用吸铁笔吸出的铁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只能无言以对。

为什么反复清洗过的零件还是有铁屑？我们分析是在磨削加工过程中，零件产生了磁性，外协厂家没有退磁处理，靠清洗也不能消除磁性残余。分析结果报告给格里希，他马上和我们一起挑选了第二批试验机油泵，到机加工车间退磁机上退磁，送到总装车间认真清洗吹干，然后一起检验，无论是吸铁笔还是白色手套，都没有任何污垢。

离开总装车间天已黑了，格里希很高兴，笑着说“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意思是为了解决问题，加班加点很正常，并热情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吃晚饭。几个小菜上桌，他的心情比较好，用中文对我们说：“格里希喜欢莴苣包菜。”我们都大为惊讶，他竟然能够说这么长的中文句子，而且很清



1984年10月，格里希同大家一起拆解试车后的柴油机，分析质量状况

晰。我倒觉得很惭愧，我的年龄几乎比他小了一半，和他一起工作了好一段时间，竟然没有学会说一个德语单词，看到了和他的巨大差距。

从第二天开始，所有机油泵出库后，首先到机加工车间退磁处理，直到厂工艺科协助外协厂家制作完成退磁机处理为止。这只是格里希解决质量问题的一个很小例子，小到在他的日记里都没有记录，但可以看到他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提高质量不要靠迎接检查

格里希对外协件的质量十分重视，而检验科对有些外协零件如柴油机水箱没有检测手段，只抽查个别水箱的连接螺孔距离，就直接投入装配线上安装。到最后的柴油机试车环节，有的水箱因砂眼而漏水，造成返修。

格里希不能允许发生这样的质量事故，对外协件质量控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扩大主要零件的抽检比例；增加重点零件的检验岗位；及时向外协厂家反馈质量问题并督促协助整改；做好零件对应生产厂家的质量记录，以选择质量优质的供货商。在解决水箱质量问题上，检验科在他的要求下，很快设计制作了一台水箱试压装置，相应增加检验岗位，配置两班检验员，对水箱进行100%试压合格后再投入装配。

外协件机油泵原来没有检验手段，只检测安装尺寸，在格里希的安排下，机修车间制造了一台机油泵试验台，让这个重要零件有了压力测试项目的检验。曲轴是柴油机

的主要零件，曲轴材料是球墨铸铁，铸造毛坯由武汉铸造厂供货，格里希亲自到武汉铸造厂商谈提高曲轴铸件质量事宜。

但是，格里希对待质量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看到，曲轴机磁力探伤检验后，丢掉了许多已完工了的曲轴（据格里希日记每天有60根之多），就询问检验员这些曲轴的缺陷是什么？得知探伤发现的裂纹大部分只是表面的砂眼和气孔（凸轮轴也有同样的情况）时，他认为这对柴油机没有大的影响，这种标准不合理。他给大家算经济账，把有气孔的曲轴装进柴油机进行耐久试验，果然对机械性能没有大的影响。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设计部门修改相关标准，减少了曲轴的报废。

格里希一直抓住提高产品质量的“牛鼻子”不放松，视用户为帝王，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

我到检验科不久，机械工业部委派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组成检查组，来厂抽查产品质量，三台柴油机中有一台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手摇启动成功，据此将全部产品判为不合



1986年9月，格里希在检验科专用工作间，检验机体零件上缸盖连接螺孔的坐标尺寸

格品。这个结果，对我厂产品声誉的影响非常严重。

1985年7月26日，格里希回国休假前，我在会上发言：“格里希厂长休假期间，我们要控制好产品质量，准备迎接部检查组来厂复查产品质量。”格里希立即插话：关于质量检查，大家不必看得非常认真。质量提高不要靠迎接检查，这是生产厂家本身的职责，不在于检查不检查。如果你质量抓上去了，不用害怕检查，人家想什么时候检查都可以。为了检查而检查，那不是搞生产、搞技术人的科学态度。我们的指导思想要明确，抓质量绝不是为了检查，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质量观念，没有质量就没有生存。只要你的质量搞上去了，莫愁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即使获得部优又怎么样？难道就满意了吗？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是部优，而是让世界上的用户称好。

有一次，我想给格里希介绍农机部质量检查标准：合格品合格率是90%，一等品合格率是93%，优等品合格率是96%。格里希连连摇头说，我们的质量要求是100%，如果有1%的产品不合格，那么对于买到这台柴油机的用户来说，他拿到的是100%的不合格品，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做到100%合格，要延长柴油机的使用寿命，让用户100%的满意。

把产品看成自己的心肝宝贝

跟格里希一起工作，常常得到耳目一新的观念，提升了我对产品质量的认知。

以前，装配完成的柴油机，运到试车房测试时，油底壳直接着地，东

倒西歪摆在走廊，全厂习以为常。格里希看到了绝不能允许，找来工艺科长，要求将柴油机摆放在工位器具上，不能让产品还没到用户手中就磕碰坏了零部件。

柴油机发放合格证后入库待售，但“入库”就是把柴油机裸放在露天，任由风吹雨打日晒夜露，大家上下班经过见怪不怪。格里希看到了心急如焚，马上叫来相关人员，很快盖成一间成品库。

同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们熟视无睹？为什么格里希视为严重问题？这是因为格里希把工厂看成自己的家，把产品看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肝宝贝，不能忍受任何损害。而我们缺乏这种情感，当然就视而不见了。

通过这些生动的现场教育，我也学着把产品视为自己的孩子，果然就会产生心痛的感觉。我把格里希的质量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全体检验员，大家的质量意识提高了，也都非常迫切希望解决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

一次，厂“三包”服务队队长袁成民向我反馈：在返修柴油机时发现，齿轮有被切削的现象，用户反映柴油机开始使用时比较紧，但是越用越好用。我立即赶去检测拆卸下来的齿轮和曲轴零件，判断柴油机开始使用时机械阻力很大，而当齿轮被切削以后阻力减小，这正是用户说“好用”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让曲轴检验员胡敏华、李敏之按照设计图纸检查曲轴的全部尺寸，发现液压仿形机床加工的一个曲轴齿轮台阶超差，而这个台阶在图纸上没有标注公差要求，也不需要精加工，所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但就是这一超差，造成了



1990年10月，格里希回访武汉柴油机厂，到装配车间查看主轴承盖加工及清洗质量

齿轮在啮合时，齿面与台阶的摩擦切削。

我们马上找来工艺科和三车间工程师一起研究，技术人员迅速重新设计了仿形靠模，工具车间很快制作了新的靠模，一举解决了问题，并使燃油消耗率大幅降低，整机清洁度得到提升。

我的工厂，我的柴油机

格里希虽年近七十，但我很难跟上他的工作节奏，因此常常受到严肃批评。

这些批评，很多确是检验管理环节出现了漏洞，我只能接受，在后续工作中改进。有的批评我觉得不是检验的责任，就感到非常委屈。一次碰头会上，格里希对一项事故提出严肃批评，并追究责任单位，与会者一下子就说是检验科。我委屈得当场就哭了，然后闹情绪，一天呆在办公室，不去车间处理问题，恨不得马上卸下检验科长的差事。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格里希到办公室找我。他没有发脾气，非常严肃地说，我们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批评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只有不

断努力才能把产品质量搞上去，这也是为了全厂职工和家属们。他说了很多话，让我感到很惭愧，我是一个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年轻人，思想觉悟还不及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退休人员。他没日没夜工作，对工作的要求往往不为我们理解和接受，仍然坚持不懈，而我缺乏主人翁精神，才出现了这样患得患失的“罢工”，确实太不应该了。从此以后，我正确对待各种批评，思想和工作都有了提高。

格里希常常苦口婆心告诫全厂职工，希望大家把工厂看成“我的工厂”，把柴油机看成“我的柴油机”，为了全体职工和家属子女，把产品精心制作好，把工厂发展好。一次碰头会上，格里希又说到工厂发展关系到子女的就业和生存。他问卢书记，你的孩子将来会到武汉柴油机厂工作吗？卢书记回答不会。他又转而问我，我也说我不希望他到工厂工作。可能这些回答让他有些失望，他说好吧，虽然你们的孩子不到这里工作，但会有很多工人的孩子要依靠工厂就业，我们把工厂搞好了，工厂有发展，也是为了全厂职工的子女们。搞得不好，工厂会倒闭，职工的生活就会有困难。当时，我们听着他的话，觉得是杞人忧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绝没有想到，这一切不幸被格里希先生言中了。

有一次，格里希问我，能不能到我家做客，我说不行。我们厂原址是武汉市行政学校，我住的宿舍是过去的教室，24平米用三合板隔成两间住两家人，在走廊做饭，环境较差。这样的宿舍有三栋，我不想让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简陋的居住环境。但是后来听邻居说，格里希去了我住的宿舍查看。不久，他向武汉市领导申请为职工修建宿舍，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市政府批



格里希送给作者的德国镀金掐丝百合花胸针和银戒指

准新建了三栋宿舍楼，格里希离任后回厂探望，特地询问我有没有搬进新宿舍楼，听说我分配到一套房时，他非常欣慰。

格里希深入基层，对大家的情况很了解，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干得好的也很少表扬，但都记在脑海里。每当他回国休假，都会带回一些小礼品，送给他认为工作努力的工人和干部。我得到过他精心挑选的镀金掐丝百合花胸针、银戒指和丝裤袜等礼品，他希望我们喜欢。

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已过去38年了，随着时间流逝，虽然很多具体事有所淡忘，但他管理一家国有企业，对武汉柴油机厂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冲击，都是不可磨灭的。

曹小麓，武汉柴油机厂退休干部，曾任检验科科长

探寻蛇山上的古刹道仙（上）

◇ 董玉梅

正应了“天下名山僧占尽”之语，蛇山自古就有寺庙存在。而且蛇山的佛寺，座座都是天下名寺，如头陀寺、龙华寺。蛇山的道观也非常著名，长春观、吕祖阁在武昌历史上都可圈可点，即使是黄鹤楼，也和道教有直接关系。

古刹头陀寺

古头陀寺这座著名古刹，是蛇山宗教文化中的重头戏。只要你寻找武昌史，就会不可避免遇到它，尤其是探寻蛇山史，根本无法回避它。但可惜的是，头陀寺的资料并不多，想还原其历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唐代时，头陀寺背后的山峦一度被称

为头陀山。黄巢起义时，诗人来鹄避居武昌，和文人墨客游头陀寺和蛇山，触景生情写有《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一诗，用“思量费子真仙子，不作头陀山下尘”的诗句，表达自己对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间烦恼、又远离尘世羽化成仙的费祎的羡慕。

唐代的来鹄，算不上什么名人，但他的诗作，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唐代头陀寺的分量，重到足以让山改寺名。也无怪乎来到武昌的人，无论名气大小，只要是文人，都会留下相关诗作。即使李白这样的诗仙，除了登临黄鹤楼，也会与友人一起游览头陀寺。759年，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程停留在江夏，遇到了长安故人南陵县令韦冰，两人遂一起游览江夏名胜，留下了《江

夏赠韦南陵》诗，其中有“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虽然遇赦，但李白仍然借用头陀寺排遣胸中的郁闷不满，甚至吟出了“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也为吾倒却鹦鹉洲”。官场失意的李白，似乎在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的不满。

虽然头陀寺的资料不多，但我们从仅有的线索中去找寻，也会发现它非常有特点。寺内有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的读书堂，他和读书堂的关系，也是头陀寺声名远扬的因素之一。

另一位唐代诗人李涉可爱多了，他多次游览头陀寺，留下《早春霁后发头陀寺寄院中》，诗句很有味道：

红楼金刹倚晴冈，雨雪初收望汉阳。
草檄可中能有暇，迎春一醉也无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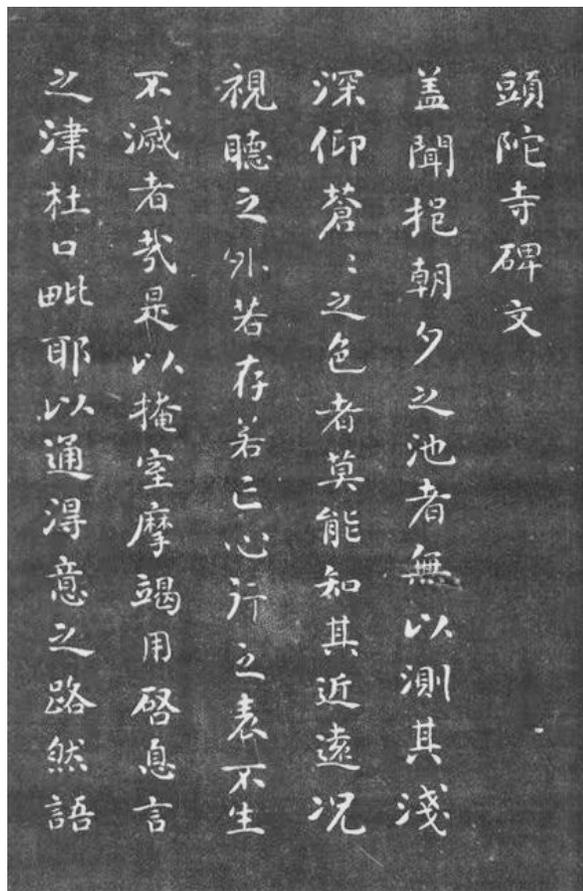
诗人用“红楼金刹”勾勒出头陀寺华丽壮美的外观，用“倚晴冈”点明了寺院的位置在山脚下倚靠着黄鹤山。在这个雨雪初收、阳光晴好的日子，真想从公干中抽出一点时间，放松心情，哪怕迎春一醉也好啊。瞧瞧，一个文人雅士在黄鹤山下的头陀寺中，酣然痛饮、醉卧春光形象跃然纸上，读来甚觉有趣。

除了诗歌，正史中的头陀寺既大气又壮观。《舆地纪胜·卷六十六·鄂州》如是记载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鹤山上。宋大明五年（461年）建。自南齐王中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黄太史诗有：‘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之句”。正史上的资料虽然只寥寥几句，就把头陀寺的位置、来历及成名的原因都交待清楚了。

头陀寺建于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胡人入侵，导致国家分裂，朝代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给民众带来无穷灾难。而佛教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以及受苦

和忍让的思想，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所以，南北朝的统治者，大多都提倡支持佛教。曾经攻克郢州的梁武帝萧衍，一生三度出家，把大量财富送进佛寺，导致国力衰减。头陀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建立的。从建立的时间而言，头陀寺确实是武昌境内名副其实的古刹。

头陀寺的出名，最重要的原因是寺里有块“头陀寺碑”，碑文收在梁萧统编的《文选·卷五十九》中。因为碑文的名气太大，在《姓氏英贤录》《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有提及。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三·坛祠志》也记载头陀寺在“黄鹤矶边，齐王筠有记。”齐王筠，就是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王中（？—505年），字简栖。他当时正在郢州为官，任郢州从事、征南记室和录事参军。



刘石庵写头陀寺碑文

他撰写的碑文有 1355 个字，在古代碑文中算长的了。

王中在碑文中记述了寺院创自僧人慧宗。南朝宋大明五年（461 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然初创时，只是简陋的小草堂，经江夏内史孔凯拓展，蔡兴宗任郢州刺史时才立为寺，寺名称为头陀寺的缘由，是“以法师景行大迦叶，故以头陀为称首”。头陀，其意为“抖擞烦恼，去离贪著，如衣抖擞，能去尘垢”。其意就是让人少欲知足，如抖去衣上尘垢一样抖掉烦恼。后来寺院日渐荒废，到齐建武年间（494—498 年），郢州刺史王藩维和江夏内史刘诒方才发动百姓利用闲暇之时整修，这就是王中见到的情形。大约王中直接参加了寺院的建设，才能触情生情，写出如此壮美的碑文。且来读读：

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南则大川浩汗，云霞之所沃荡。北则层峰削成，日月之所回薄。西眺城邑，百雉纡徐。东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胜地也。

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为何如此钟情于蛇山，钟情于头陀寺？他究竟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才能用上述语言描述头陀寺？

在碑文中，王中也赞美了郢州刺史王藩维和江夏内史刘诒，赞美在他们的治理下，江夏“政肃刑清”“百姓有余”“天下无事”，才会“民以悦来，工以心竞”，终于有了“层轩延袤”“飞阁逶迤”的恢宏名寺。所以，王中写头陀寺碑文，并非完全是为了记录头陀寺，也是对郢州城百姓安宁的一种褒奖：

……乃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观政藩维，树风江汉，择方城之令典，酌龟蒙之故实。政肃刑清，於是乎在。宁远将军

长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刘府君诒，智刃所游，日新月故；道胜之韵，虚往实归。因百姓之有馀，间天下之无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

於是民以悦来，工以心竞。巨丘被陵，因高就远。层轩延袤，上出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夕露为珠网，朝霞为丹膜。九衢之草千计，四照之花万品。崖谷共清，风泉相涣。金资宝相，永藉闲安；息心了义，终焉游集。

法师释昙珍业行淳脩，理怀渊远，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劳事功，既镂文於钟鼎；言时称伐，亦树碑於宗庙。……

由于碑文大气磅礴、文字精美，被历代书家所喜爱。

唐代著名书法家殷令名尤其喜欢头陀寺碑文，他留下的《头陀寺碑》墨迹，成为其书法代表作，被历代藏家精心收藏。世居襄阳的著名书法家米芾在 38 岁那年，即宋



米芾画像



韩熙载画像（清殿藏本）

元祐三年（1088年）戊辰九月，用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一幅《古帝王图》换来了殷令名的这幅墨迹。

一般人只知道王维是诗人，他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是千古名句。然而，王维在山水画方面的造诣也不低，甚至可以说和他的诗歌造诣一样高，被后人称为“南宗山水画”的鼻祖。虽然米芾收藏的这幅画不是山水画，但毕竟是王维的作品；米芾愿意用《古帝王图》换取《头陀寺碑》墨迹，可见墨迹的价值不低。确实也是，这幅墨迹上留有唐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宰相韩滉的题跋和印章。（注：韩滉不止是宰相，也是著名书法家，也是以画马著称的画家。但韩滉留给世间的精品却是《五牛图》，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趣事）米芾拿到《头陀寺碑》墨迹后，找朋友一起鉴定，确定是唐高祖武德年间的真迹后，非常高兴，当即为这幅墨迹题了跋。

《头陀寺碑》墨迹才历两朝，就牵出

了殷令名、王维、韩滉、米芾等唐宋时代的文化大家，真是无价之宝啊。而这无价之宝的依托就是头陀寺。头陀寺的历史哪里只关乎佛门呢？其中沉淀的还有艺术史、文化史以及诸多文化深意。正是有了头陀寺碑文，才让我们多少知晓一点悠远古刹的点滴历史。

总有人说，武汉没文化。其实，武汉的文化何其深厚，犹如沧海一样难以探究。亦如我，为了把米芾与这篇《头陀寺碑》墨迹的关系梳理清楚，竟费了好几天的时间！真是汗颜啊！

头陀寺也和很多古建筑一样，屡毁屡建。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入蜀为官途中，写有《入蜀记》，记载沿途的风俗民情。在武昌逗留期间，看遍武昌名胜。因此，他的记录对了解唐宋时代的武昌很有参考价值。他记录头陀寺曾毁于兵火，是汴僧舜广费心劳力，住持头陀寺30年，才让头陀寺重新具有一定规模。这样的记录，无疑对梳理头陀寺的历史很有帮助。

陆游对《头陀寺碑》的记载非常详细，从中可知立于唐开元六年（718年），位于



陆游画像

藏殿之后。这块碑也牵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三位大家。第一，立碑时选择的碑文墨迹，由苏州刺史张庭珪（658—734年）书，张庭珪少年即以文学知名，其书法甚好，善于楷书、隶书，甚为当时人所重；第二，碑阴由南唐名臣韩熙载（902—970年）撰；第三，题额是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920—974年），他的著述很多，今人可读到的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解字韵谱》10卷。

陆游对《头陀寺碑》很感兴趣，估计与韩熙载有关。陆游撰著《南唐书》时，曾为韩熙载立过传。他评价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五代十国时的南唐画家顾闳中曾绘有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全过程，分为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个场景。这大概也是韩熙载“恶名”远扬的重要原因。但韩熙载精音律，善书画，高才博学，为文尤其长于碑碣，所作制诰典雅。故而请其写碑表的人非常多。他参与立《头陀寺碑》，确实为头陀寺增加了很多的谈资。

关于这块碑的另一个故事，是抄写碑文的张庭珪与韩熙载、徐锴相隔200多年。想来立这块碑时，碑文的墨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不然，怎么解释碑文与碑阴、碑额的撰者相隔这么久的时间呢？

但陆游看到的这块碑不是原碑，碑文中有下述文字：“唐岁在己巳，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知军州事杨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县主簿秘书省正字韩夔书。”碑阴也有韩熙载的文字：“乃命犹子

夔，正其旧本，而刊写之。”好好的碑，为什么要重立呢？为什么又不用张庭珪的墨迹而改用韩熙载侄儿韩夔的墨迹呢？

这和南唐烈祖徐知诰（李昇）有关系。徐知诰有个养父叫徐温（862—927年），早年是个盐贩子，后被封为温国公、齐国公。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李昇）建立南唐，追谥养父为“忠武皇帝”。因为“忠武皇帝”的名字中有个“温”，其他人就必须避讳“温”字了，虽然张庭珪已经去世200多年了，但谁让他的字是“温玉”呢？所以，头陀寺碑必须换掉。无奈之下，韩熙载就让韩夔重书碑文墨迹。一个死了的盐贩子，只因养子登了基，地位就高于文化大家了。专制社会确实有其很大的弊端。

看过碑文后，陆游写下了《头陀寺观王简栖碑有感》：

舟车如织喜身闲，独访遗碑草棘间。
世远空惊阅陵谷，文浮未可敌江山。
老僧西逝新成塔，旧守东归正掩关。
笑我驱驰竟安往，夕阳飞鸟亦知还。



1869年江夏县志图中的观音阁

据清康熙《湖广通志》载，重刻的头陀寺碑毁于明末，清顺治年间，由邑人陈应魁重立。

说了这么多，可头陀寺到底在哪里？清康熙《湖广通志·卷三·坛祠志》有明确答案：“今观音阁，相传即头陀寺。明末火，国朝初重建。”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也持相同观点：“头陀寺在黄鹤矶，即今观音阁，一名竹林寺。”《湖北金石存佚考》是最准确指出寺址所在的文献：“头陀寺故址，近人以为即今汉阳门外滨江观音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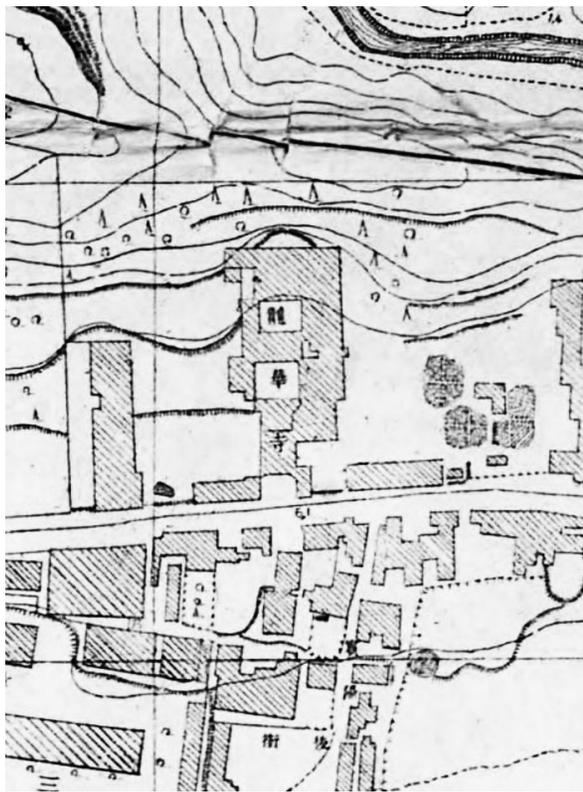
关于头陀寺的位置，古诗中的内容也可印证。白居易在《赴黄鹤楼卢侍御宴》一诗中有：“江边黄鹤古时楼，劳置华筵待我游……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有这“白花浪溅”的画面，就知与黄鹤楼遥相辉映的头陀寺确实在江边。

头陀寺何时变成观音阁的呢？早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湖广图经志》中的《江夏县图》中，就明白无误的标出了观音阁。可见，至少在明正德年间，观音阁就已经取代了头陀寺，这座千年古刹在武昌的历史结束了。

太监捐修龙华寺

蛇山南麓的龙华寺，是明代修建的古庙。这个古庙的来历和一位太监的孝行相关。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作为钦差大臣的太监王大本的母亲病了，为给母亲治病，王大本便在蛇山南麓开出一方净土，请求皇帝御赐匾额，定名龙华寺。因有御赐匾额，龙华寺香火极旺，历弘治十三年（1500年），在太监刘邦咏的主持下开始扩建，至弘治十五年已是佛殿巍峨，宝相庄严，桥梁镂空，柏竹丛绕，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丛林。



1909年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中的龙华寺

清代李宝嘉所著谴责、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八回《丫姑爷乘龙充快婿知客僧拉马认干娘》中大段描述说：“……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龙华寺。这龙华寺坐落在宾阳门内，乃是个极大丛林，听说亦有千几百年的香火了。寺里居中一座‘大雄宝殿’，供的是释迦牟尼。此外观音殿、罗汉堂、斋堂、客堂、禅堂、僧房，曲曲湾湾，已经不在少处。另外还有精室，专备接待女客。因为龙华寺是武昌名胜所在，所以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就是过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来的。”不仅如此，此书还用大段文字记录了龙华寺的和尚们如何与官员太太们交往并从中获得大量“布施”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龙华寺残存的历史建筑面积还有2000多平方米，可是，在城市建设的轰鸣声中，古刹被推平，原址上兴

建起一座龙华大厦。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龙华寺在蛇山南坡重建，且寺内还保有两块明代石碑。其中之一年代久远，字迹漫漶；另一个《重修龙华寺殿廊记》碑，字迹清晰可辨：

浮屠设像教以尊佛，而佛僧藉于居此，土木之工所由兴也。故舍财之主，募缘之僧，相续为之经营。然后厥功成斯寺之制：佛殿五，观音殿、天王殿、山门各三，钟楼一，东西廊舍四十有八，总二百六十四楹。……始于成化十三年，钦差镇守湖广、司设监太监王大本新创。继之者：御马监太监刘邦咏，弘治十三年春为之重修。助之者……

承刘太监令也，工完于弘治十五年冬。巍然焕然……

弘治十五年壬戌十一月十五日立石，德安孙伯乐镌石。

碑文中的信息量很大，从中我们知道龙华寺建于成化十三年；从王大本至刘邦咏，从初建到扩建，都是宫中太监所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龙华寺初建时就有御赐匾额的原因。正是有了宫中的背景，才有“舍财之主，募缘之僧，相续为之经营”；正是因为有宫中的支持，龙华寺才有财力进行扩建。从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年，不过25年的时光，一个新建的寺院占地就达到6000多平方米，这是普通寺院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龙华寺背后的南坡上，有古摩崖“小石泉”，这里当是龙华寺僧的饮用水源。《江夏县志》记载：“蛇山南坡有崖如壁，崖下有小潭，水甘清冽，此即小石泉。”可惜的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崖下小潭早已干涸，崖壁上的“小”字已不存，“石”字存一半，只有“泉”字让我们去揣摩小石泉到底如何甘、如何清了。另一个遗憾是，摩崖的落款

仅存“五月十日”和“郑”字。而郑系何人，也只有等待石头开口说话了。

1958年，武汉市在宗教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既照顾僧尼宗教生活的需要，又便于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的原则，把全市僧尼从272个寺庙集中到16个丛林之中。武昌大小庙宇的僧尼则分别集中到宝通寺、莲溪寺、龙华寺、九峰寺和卓刀泉寺5座寺庙中。从72座小庙集中起来的172位比丘尼，被分配到龙华寺。龙华寺大和尚遂把寺院腾出让比丘尼入住，龙华寺至此成为比丘尼寺院。比丘尼白天在外从事生产，晚上回寺院过宗教生活。“文革”中，比丘尼被遣散，寺院房舍、土地被其他机构占用，寺内珍藏的大批历史文物，如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三尊铁佛，自然生成的神龙护墙，大批的古碑石刻、兔儿石、猫儿石等均散失。

1978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龙华寺收回部分房产和土地，回来修行的比丘尼达到100多人，但那些珍贵的文物不知所终。只剩上述两通石碑和龙华寺后山上一座年代较远的佛塔，可佛塔内安放的是哪位高僧呢？

2009年冬，在蛇山透绿的倡议下，曾经有人提议，把龙华寺迁往九峰，我曾经和程涛平、刘谦定一起，专程来到龙华寺。我们非常坚决的认为龙华寺应该留在原址。我们的意见得到了重视，龙华寺保留在原址上（待续）。

董玉梅，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科技人文相宜 学术人品俱佳 ——送别杨叔子校长

◇ 吴廷俊

学界巨星陨落，喻园肃穆！惊闻德高望重的杨叔子校长病逝的噩耗，不觉悲从中来，他的慈祥面容出现在眼前！

杨叔子出身名门，天资聪慧，记忆超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1月出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任期满后又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几十年来，杨叔子对学校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文质彬彬的人品风范在喻园广为传颂，为认识他的人所公认。

—

华中理工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是一所纯工科大学，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转变。

1979年，老校长朱九思先生在访问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后，谈及一个突出感



1999年4月28日，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成立一周年，老校长杨叔子（右）与校长周济（左）为学院揭牌

受：“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并且这些著名大学开始并不是综合性的，而是单学科的，由单学科逐渐发展成多学科综合性的——这是著名大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规

律。所以，华中工学院从1979年开始就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很快办起了理科、文科的系、所，并呈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华工文科发展变缓，1990年代后更有下滑的趋势。学校文科尚没有被国家教委承认，我们的科研课题报不上去。

杨叔子校长虽然是工科出身，是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家学渊源，有很深厚的人文功底和人文情怀，深知发展文科对育人的重要性、对学校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就前者而言，他认为，高校的使命是“育人”，而非“制器”，即培养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但长久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却表现出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等问题，掣肘着人的全面发展。从后者而言，他完全赞同朱九思先生的办学理念，学校要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走综合型发展道路；办一流大学，除了有一流的理工科，还必须有一流的文科。所以，他上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中兴文科。

当时，校园里充斥着浓厚的工科氛围，学校领导、学校各部处负责人几乎全部都是工科出身的，他们太不了解文科的特点或规律。学校每年制定发展计划，基本上没有关于文科的条款，文科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在管理上，从不考虑文科的学科特性，完全按工科思维和要求管理文科。文科各系、所、中心在学科发展上，与学校领导和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似乎很难沟通，很难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如对文科是否有科研，文科的科研是什么，都争论不休。对个人写的文章、出版的著作算不算科研成果，都表示有疑问。

为了改造华工校园里单一的工科文化，杨校长在领导班子统一思想后，1995年面

向各层次学生首次举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随后，又大力支持开办人文讲座、创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华工乃至全国高校界掀起了一股“人文风暴”，逐渐改变单一的工科校园文化氛围。

为了尽快振兴文科，杨校长开展广泛调查研究，多方听取广大文科教师的意见，了解学校文科发展放缓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广大文科教师尖锐指出，华工文科近几年来发展速度变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学校领导的问题，是领导的思想认识上存在两个“不够”，即对办综合大学认识不够，对办文科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领导口头上说文科重要，实际上不当回事，或只当摆设，或让其自生自灭；甚至有个别领导把文科当负担，当包袱，恨不得甩掉省事。

1989年8月，学校撤销全校各文科系所的正处级编制，成立一个正处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简称“人文学部”），所辖社科系、哲学系、外语系、中文系、语言研究所、新闻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所。人文学部成立党总支，同时撤销上述各系、所、中心的党总支。人文学部成立后，提出“系办专业”的方针，收缴系、所、中心原有的党务、政务、教务、财务、科研管理和学生管理等所有权限，使其只相当于一个教研室。压缩规模、变更体制，华工文科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杨校长在听取文科教师的意见后，向党委提出：撤销“人文学部”，成立“文学院”。1994年1月，学校撤销人文学部，发文成立文学院，由学校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献君兼任院长，辖新闻、中文、哲学、政法、社会学、艺术等六个系。文学院是学校建设发展文科的领导决策机构，担负四项任务：

一是探求理工科大学办有特色文科的规律、制度和相应政策，并督促各系执行之；二是对外联络，含对国外、校外的联络，首先争取社会的支持，争取国家教委的支持，并逐步与国外的学校建立联系，走向世界；三是通盘考虑专业设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四是向学校和社会争取经费，适当增加教学和科研设备，大量添置图书资料，改善教师工作条件。从人文学部到文学院，不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一个管理体制的变化。

不仅如此，文学院的成立，更是办学指导思想的变化：人文学部是以管控为本位，而文学院是以发展为宗旨。院长刘献君是一位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凡是有益于学科发展的就支持。”所以，文学院建立后，有效争取校内外资源，狠抓学科建设，尤其是特色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华工文科发展很快进入快车道。

至2006年，经过12年的建设，华中科技大学文科特色发展已初见成效：一是学科布局日趋完善，大多数学科覆盖了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省重点学科和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28个本科专业）；二是发展规模初步形成，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150人以上，学生数量达到较大规模，建成8栋文科大楼；三是学科优势开始显现，通过重点学科突破、交叉学科融合，为学校综合办学实力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二

杨校长不仅学问做得好，成为华工第一个中科院院士，而且人品冰清玉洁，无论公德还是私德，均堪称楷模。

他的家国情怀，溢于言表，体现在他人生的每个关键点，体现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激动地写下了《七律·喜讯批准入党》，用“自此螺钉装配罢，无朝无夜奋奔腾”表白心意；入党后，将自己的一切同党联系在一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81年，杨叔子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高级访问学者。由于表现突出，临近访问期满，美国方面以优厚的待遇来挽留，希望他延期返华。杨叔子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当有人问他为何这样选择时，他说：“出国就是为了回国”，出国深造，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知识，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90年代，谈到倡导人文素质教育的用意时，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

杨校长品德高尚，不愧谦谦君子。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我时时为他的品德所折服。比如，1993年，我还只是副教授、新闻系的副系主任，与院士、校长之间相隔好几个层次，当杨校长从刘献君院长那里听说我对发展文科有些想法时，立即要校办打电话约我。当时，一则出于对文科发展下行状况的深切忧郁，二则“直筒子”性格使然，我在向杨校长汇报想法时，无论是内容还是语气，都有一些不合自己身份的表现，简直有点“冒犯”。

事后，我有点后悔甚至后怕，悔不该那么不知轻重，不管不顾，怕以后遭报复。但是杨校长对我的“放胆言说”“冒犯领导”好像一点都没有不高兴的表现，他一直听



2011年4月10日，华中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第二届期满换届时，作者与杨叔子院士（右）合影

我讲，听后只说了一句：非常谢谢，我们会认真研究你的意见的，随后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后来，杨校长不仅没有给我小鞋穿，相反给予我信任和支持。

1995年，我负责筹备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杨校长3月、9月两次听取我关于大会筹备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关指示。

2000年6月，杨叔子虽然已卸任校长职务，但是为学校文科博士点申报一事，他还和周济校长带领我们几个文科院系负责人“跑步（部）进京”。北京的五天活动，使我亲自领略到这两位领导为了学校发展文科一事，所表现出的鞠躬尽瘁精神和雷厉风行办事风格。

杨叔子院士任校长时，我妻子万锦屏在校办任副主任，主要为杨校长做秘书工作。1997年6月，杨校长任期满，转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来，万锦屏也调至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前后在杨校长直接领导下工作11年，深得杨校长的关心和爱护，也从杨校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品质。在《杨

叔子散文序函类文选》的后记中，杨校长特别写道：同万锦屏同志相处，头尾11年。我的工作中，渗透了她默默无言的心血，我“衷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外，每年大年初一清早，第一个打电话来拜年的，一般都是杨校长，并且开口就说：感谢吴院长对发展学校新闻教育所做的贡献，感谢万主任多年对我工作的支持！真弄得我们不好意思，只能重复说一句话：谢谢德高望重的杨校长，祝您身体健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生病、行动

说话困难后才终止。这些事情虽小，但反映出杨校长身上谦谦君子的美德。对此，在心底我引为学习的楷模。只是他的君子言行与生俱来，我想学，也只是皮毛，因而只有敬佩的份。他赐予我的几部他的著作《杨叔子教育杂论选》（上下）、《杨叔子散文序函类文选》（上下）、《杨叔子槛外诗文选》，我都比较认真地读过，从中获益不少。

杨院士很幽默，有时我们到他家里去看望他，每次，他和夫人都会到门口迎接。他夫人徐辉碧教授，先后任本校化学学院院长、生命学院院长。见面后，我们说，杨院士好，徐院长好！杨校长会接一句：我们家是院长管院士。于是四人都大笑了。

杨校长一生辛劳，驾鹤西去，愿他在天国好好休息。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1998年至2006年任学院创院院长

“三人照”上的高欣荣与林巧稚

◇ 姬绍先



这张“三人照”，是我国妇产科学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教授和高欣荣教授与美国朋友的早年合影，是目前发现的两位前辈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唯一留影。

林巧稚教授是“三人照”持有者，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教授周华康夫人的亲姑姑，也一直生活在周教授家中由其照料。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教授仙逝，照片由周教授保存，尔后

提供给新华社。照片公开发表时，新华社标明：“1939年美国林巧稚（右）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进修周华康提供。”

“三人照”公开发表已近40年，拍摄更达83年之久。我在2021年偶遇照片的影印件，见到右侧是我的老师林巧稚教授，但左侧那位中国前辈是谁呢？

确认“三人照”左侧是高欣荣

一看到照片，我感觉左侧前辈很像我工作的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后改名中心医院）老院长高欣荣，为此引起我进行考证。

我当即找到医院老教授郑英键等前辈辨认，他们与高教授及她的弟弟、外科专家高有炳共事30余年，异口同声说：“这是年轻时代的高教授。”

我又联系高家晚辈，同样得到确认。晚辈说“家中没有这张照片，第一次看到”，同时提供了高教授年轻时代的照片。我为之细心比对，看来“三人照”左侧是老院长无疑了。

1973年3月，我从陕西省陇县人民医院调到武汉市第二医院外科工作。高教授担任医院副院长，知道我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很高兴地对我说：“曾经与林巧稚教授



1940年重庆，高欣荣（左三）周穆英（左一）

在美国有过一段交集……”留下悬念。如今，只能从这张“三人照”中，探讨和遐想两位前辈的友谊和那段历史了。

经初步考证，“三人照”时间：1939年2月末；地点：加拿大温哥华港；缘由：高欣荣结束在美留学取道加拿大回国参加抗战，林巧稚专程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到温哥华送别，在海轮上合影留念；拍摄者：美国朋友。

高欣荣回国投身抗战

据史料记载，高教授留学美国的时间为1936年6月至1939年2月，林教授留学美国的时间为1939年至1940年5月，两位前辈在美国的交集时间仅一个多月，而且分别在两个城市，平时是难得相会的。

1939年2月，高欣荣已在



1956年高家三代同堂后排高欣荣（中）与两位弟弟及家属



1936年高欣荣留学美国登记照（邓国仁提供）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州梅厄氏研究院学习两年半，攻读博士学位，加入了美国医学会，准备赴欧洲瑞士继续深造。

此时，一位刚从中国来的英籍医师，到明尼苏达州梅厄氏研究院演讲，讲述他看到日寇侵华的暴行，更看到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英勇抗战的精神，号召医务界同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高欣荣听到祖国正在经受危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放弃赴瑞士深造的计划，回国投入抗日战争。她婉拒了朋友们的建议，告别了老师 Maclang（梅厄氏研究院病理室主任），她说：“我是中国人，不需要别人动员，我与周穆英医师决定回国！”“祖国更需要我救治伤员。”（本文涉及英文资料由何玲协助翻译）

于是，高欣荣与同窗密友周穆英结伴回国，并告知好友林巧稚，预订船票取道加拿大回国。

完成以上安排，要花费时间。所以把高欣荣启程回国的具体日期，推定为1939年2月末。据史料记载，高欣荣取道温哥华

到达香港，旅程大约一个月左右；再从越南河内辗转回国到昆明、贵阳，于5月3日抵达重庆又需一个月左右，时间上是吻合的。温哥华属于海洋性气候，二月份平均气温在2—8度，照片中的着装符合气候特征。据我的同学邓国仁教授（旅美学者）考证：当年，中美之间人员往来，都是经旧金山或温哥华乘海轮往返。

高教授和林教授在美国学习期间，没有其他任何照片问世，说明她俩都没有照相机，照片是由美国朋友拍摄的。

高教授在回忆录中说：“自己的祖国正在需要我们，我们还能在这里学习吗？于是我们就积极准备回国参与抢救工作，取道加拿大、香港、越南到昆明、贵阳，于五月三日到达重庆。适该处遭到五三、五四大轰炸，人民死伤甚多，我们临时住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协助抢救工作……”

到达重庆的当天，高欣荣和周穆英向政府卫生署报到，署长接见了她们，后安排到重庆三圣宫卫生所工作。



1929年高欣荣岭南大学夏葛医学院毕业照

由于日机轰炸接连造成惨案，死伤 6314 人，其中死亡 3991 人，财产损失无数。高欣荣和周穆英立即投入了战地救治，成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日战士。重庆中央医院成立后，她俩担任妇产科正副主任（周穆英后因积劳成疾，患胃癌于 1947 年病故）。

1940 年 5 月，林巧稚也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原高氏医院（1920 年建）

高欣荣与林巧稚的交往之谊

高欣荣赴美留学前，有两年多在天津妇婴医院进修和工作，与周穆英利用节假日，去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短期研学，得到妇产科主任、英国人马士敦（又译麦克斯韦）教授的指导，并为她写了几封推荐信，促成她俩赴美留学。同期，林巧稚已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讲师、主治医师。在时空节点上，三位前辈有过交集。

1948 年，高欣荣与大弟高有焕（内科医生）、小弟高有炳（外科医生）合作，在武汉创办了“高氏医院”。

林巧稚、高欣荣在妇产科学界，享有“北林南高”之美誉。

1952 年，高欣荣在北京参加中华医学会大会，与林巧稚及梁毅文、何碧辉等留美学友相聚，畅叙往事，畅谈事业。林巧稚邀请高欣荣到家做客，相谈甚欢，并向她展示自己珍藏的相册（见《一代名医高欣荣》），高欣荣应见过这张“三人照”。

林巧稚和高欣荣是同一时期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及 1965 年林巧稚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性妇产科学术大会期间，也有见面交流的机会。

我与两位前辈的人生交集

林巧稚教授（1901—1983），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961—1968 年，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林教授任妇产科主任。她自信满满又和蔼可亲，体型偏瘦但行动敏捷。

高欣荣教授（1905—1997），我国著名妇产科学专家，荆楚大地妇产科学开拓者、奠基人，曾任武汉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

名誉院长和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973年我调到第二医院，高教授是武汉市著名专家。她和颜悦色，是我尊敬的长辈和领导，一起工作20余年。

我家曾与高家是“近邻”，她小弟高有炳是我院外科的创始人，培养了几代外科医生，我是其中之一。她的大侄儿也从事外科工作，与我同事多年。

同时顺便一说，我与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周华康教授之间，也有一件事终生难忘。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前夕，我进入临床实习到儿科时，没有买到《儿科学》教材，就在医生办公室抄录相关资料。周华康教授见到问明原委，马上说“这么多的内容，很难抄啊。我送你一本，全部资料都有了。”他从书柜取出他主编的《儿科学》，扉页还盖有他的印章。我喜出望外，毕业后这本书伴随我从北京到陕西，然后又带回武汉，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中。

这张看似平常的“三人照”，凝聚着林巧稚、高欣荣两位前辈的情谊，真实记录



高欣荣教授在田间地头巡回医疗



高欣荣教授坚持坐班接诊

了林巧稚送别高欣荣回国参加抗战的具体场景。

林巧稚、高欣荣两位前辈有许多共同点，反映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独有特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她俩都婉拒“留在美国发展”，毅然回到祖国从事“医学救国”，为抗日军民实施医疗救护。抗战胜利后，她俩分别建立医院诊所，低价济民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两位前辈积极支援国家发展，将自己的医院诊所交给了国家。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她俩终身未婚，一心奉献于医学事业。

两位前辈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脑海中，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姬绍先，政协武汉市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武汉中心医院原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